

老子大学主办

红色新青年



人文工作月报（总第 11 期）

2024 年 1 月小寒号



《红色新青年》编委会

总顾问：

雷公 李政 唐仁义
黎鸣 石镓 神圣人
曾向东 华乔 泉头

总编辑：

朱云川 15998980906（重庆）
郭向锋 15193689604（庆阳）
宋心宽 18141905384（北京）
蒋郎兵 13983654902（重庆）

总编室：

共同主义 ABC
关山情 曹公渡 何泳飞
藏闲居 马文杰 熠之
肖月 蓝海浪花 海吟
王鹤云 清风明月 森帅
幸福人 谢国华 淼淼
富雪梅 仇景 彩虹
高正军 今生 吴子
智者说 张国群 何建军
赵华 肖起国 施晓渝

兴国网-老子大学

www.gczyabc.cn

QQ 投稿：241839300

实事求是 学术争鸣
道德自律 文责自负
本期责编：朱云川

【学术在民间】

朱云川：神奇见证老子道德七常观- 1 -
当代圣贤朱云川先生的思想之旅（续篇）- 2 -
当代圣贤赋——题赠朱云川老师- 4 -
天文苑：重订堪定中华民族新六经倡议- 7 -

【卢其旺专栏】

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的真相（中）
一、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两条路线- 16 -
二、把造反派与地富分子联系起来- 18 -
三、杀人风的形成- 20 -
四、“革联”成员被杀情况- 21 -
五、地富及其子女被杀情况- 23 -
六、以“叛徒”名义杀害无辜群众- 25 -
七、“我们没有剥削”- 27 -
八、杀人放“卫星”- 28 -
九、什么人被杀- 30 -
十、结论：道县杀人事件的真相- 31 -
彻底批判“出身决定论”- 32 -
“哲”考- 40 -

【智者说专栏】

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哲学- 42 -
中国可能超越西方的关键点- 43 -
神秘的东方智慧并非不可捉摸- 48 -

【学术在民间】

朱云川：神奇见证老子道德七常观

老子道经第一章，提出众妙之门——众人莫名其妙，不得其门而入；德经第一章，提出道德七常观——道德仁义礼智信，众人依然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其实，若以当代圣贤朱老师提出的老学三原则——以老解老、道法自然、易知易行的，可举重若轻，一举破解之：

其一，道家正治。上德为道(正、识)治，无为而无以为。太上，下之又之。人民自己做、当家作主人。

太上(道德)，下知又之。

——吾言易知易行，道为明白，德为实干，坚持以正确道理去指导社会实践，君王按道德去做，恪守本分，不为难下属和百姓，个个轻松，人人可行。又之，下属百姓重复道德，有样学样，天下太平。

太上(圣贤)，不知有之。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天下人不明白圣贤道德，只有自己在黑暗中瞎摸，是以盲人摸象、自以为是，不知所云，无所适从，坐等神仙下凡，救世主再生。

其二，墨家德治。下德(上仁)为德治，有为而无以为，其次亲之。让领袖为人民服务，贤者替人民当家作主。

其三，儒家人治。上义为仁(人)治，有为而有以为，其次誉之。人心所向，民主投票，虽有私心，已不靠谱，只是比法治相对好一点。

其四，法家法治。上礼为义(法)治，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其次畏之。规矩法则，严刑峻法，党同伐异，酷吏横行，司法腐败，难守社会底线也。

其五，兵家力治。礼者为力(兵)治，暴力维稳，其次侮之。此为忠信之薄，而乱之始也。天下已无理可讲，内忧外患，狼烟四起，人民哭骂不管用，只有武装斗争，以暴力胜败说话。

其六，杂家知治。前识者为知(智)治，故以知治国，国之贼(亡国之君)也。此为道之华，而愚之始也。盲人摸象，裂道自专，道听途说，信步乱走，瞎指挥，乱作为，处处有难，步步是坑。

其七，宗教、鬼神信治。信者为忠(宗教)治，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用不上)。诚为无计可施，自欺欺人，只说不干，躺平坐等，待圣贤出山救世也。

是以大丈夫居其厚(德)，不居其薄(礼、忠信)；居其实(道、识)，不居其华(智、前识)。圣人当重道行德，而不取智信也。一句话，道德重用好，仁义礼智信不可取。

总之，老子德经第一章的核心价值观，神奇的道德七常观如下：

圣人尊道贵德，道本德用为太上。仁义可用不可重用，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弃智(前识、智慧)，远信(忠信、鬼神)，则天下太平也。

#细品道德经# #探讨道家的无为#

当代圣贤朱云川先生的思想之旅（续篇）

仰望星空、叩问苍穹的追梦人

——当代圣贤朱云川先生的思想之旅（续篇）

作者/郭向锋

【导读】朱云川先生是一位有理想、有担当的文化学者，他将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开创了文化先行、共同主义、五大保障、八个共同的新思路和新实践，为实现国家和人类的公平正义贡献了力量。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朱老师的思想为人们带来了希望和启迪，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八十年代的诗坛上，曾有一句很流行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这句锥心泣血、直抵灵魂的表白，反映了那个年代从十年动荡中一路走来的年轻人对现实的深切关注和对未来的深度思考。最初从潘晓对人生意义的质疑到对社会变革的争论及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曾在思想理论界一石激起千层浪，使思想解放的大潮如万马奔腾、一泻千里，并造就了无数的理想主义者，使人至今想起来依然血脉喷张、青春勃发。

那个年代，朱老师正值青春年华，他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在关注现实，关注各种思想文化，并开始探索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他在课余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社科书籍，尤其是马恩列毛的著作和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典籍，均在涉猎范围之内。他的心与青春理想共涌动，与社会变革同振动。他写下了好多的感想，

并把这些思想碎片连缀起来，以期形成独特的思想。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东共产主义国家纷纷改辙易帜走向解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资本主义国家乘机兴风作浪，纷纷大肆宣扬自己的制度优势和文化的先进性，并不惜动用各种强势手段兜售推广自己的普世价值观。许多国人也对自己的制度、文化、方向、道路失去了自信，盲目崇拜西方的一切，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更有甚者还沦为了西方的代言人和汉奸走狗，出卖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极力唱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历史，各种邪说谬论甚嚣尘上误人不浅。当是时，文化理论界亟待正本清源，人们的思想雾霾亟待拨云见日，人类未来的航道亟待破开坚冰。

时代大潮，滚滚奔涌；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干将镆铳，千锤百炼，削铁如泥；英雄敢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有良知、有使命担当、有价值操守的知识分子在思考、在探索，他们既使在艰险中也从未停下为真理正义而奋斗的脚步。

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多年来一直以子规啼血、精卫填海般的精神勇气上下求索的朱云川先生，将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的哲学思想植入政治经济学，给这一传统学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赋予了不朽的灵魂，使伟大的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拥有了丰饶的沃土和深厚的根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治国理政方略的发展与创新。

文化是政治经济的灵魂，并非是其派生物。一个国家独特的文化思想决定了这个国家独特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方向；也决定了这个国家独特的发展模式与治理模式；还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认同；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短期发展与永续发展思路；更决定了这个国家兴衰存亡的国运。

纵览人类历史，文化的决定作用非常强大。曾经辉煌强盛一时的古罗马帝国就毁于骄奢淫逸、纵欲享乐的思想文化；正是这些邪恶的文化思想观念泛滥成灾，从而导致了盛极一时的古罗马帝国灰飞烟灭。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在步西方后尘快速发展起来之时，因武士道文化和军国主义思想残滓泛起，死灰复燃，加上效忠天皇的愚民文化推波助澜，最终导致日本走向了对外侵略扩张、大肆屠戮的邪恶的发展道路，最终导致严重惨败，并第一次尝到了原子弹的劣味。

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知识分子崇尚清谈论玄，不关国事；各级官员争名夺利、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最终个个都走向了快速覆亡的道路。

大清王朝一直遵循“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僵化思想，抱残守缺，不思进取，最终被外国列强长驱直入，导致出现了割地赔款、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惨状，致使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很快土崩瓦解。

中国人的骨子里有一种平等观念，即“不患穷，只患不公”。坊间流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俚语论调，反映了民族文化中积淀已久的平等观念。

中国共产党正是本着为人民翻身得解放、为人民打江山谋幸福的理想宗旨，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今我们党开创的走向全民共同富裕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一执政理念，正是在为国家、为人类实现公平正义的基础上，走向永续发展的和谐世界目标。

而朱老师的“文化先行”、“共同主义”、“五大保障”、“八个共同”正是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新思路、新实践、新突破，具有来自民间的无限亲和力和永久凝聚力。如此上下呼应、干群一心，众志成城，方可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无穷的创造活力。

我们只要从他的博深思想汇海里采撷几朵浪花，便可窥一斑而见全豹。

当代圣贤赋——题赠朱云川老师

作者/郭向锋

伟哉神州！上下五千年，华夏文明星河灿烂、群贤毕至；纵横九万里，中华大地山川竞秀、百舸争流。大哉炎黄！黄钟大吕奏响多少恢宏乐章，如椽巨笔绘就无数春秋梦想。

昔有古圣老孔，应劫而生，横空出世；义言一出，震古烁今，堪为万世宏论；近有伟人毛公，诞生于湖南湘岸，惊天豪情，绝世抱负，摧枯拉朽，改天换地，拯救万民，功昭日月。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今有学者朱师，任教

于圣源书院，崭露头角，顺势而起；高论一出，石破天惊，堪为亿众心声。千秋圣哲，弘扬大道之理，探寻宇宙玄机；当代文胆，溯源历史发展动因，探索未来前进之路；发前人之未发，言前人之未言。洋洋洒洒数十卷，浩浩荡荡千万言；博古通今纵论天下，丹心妙手编撰新刊。

昔年两弹一星举世震惊，而今两刊一新独占鳌头。昔有左思三都赋洛阳纸贵，今有朱师共产论网页霸屏。古有老聃庄周道贯百世，今有朱师宏论思接千载。广纳博采百家之论，中西合璧自成一体。剖析社会现实抽丝剥茧，谈论终极价值条分缕析；诊文明弊病切中要害，开济世良方效专力宏。

志同道合者风云集会，赤胆忠心人共商国是。陈师卢师谢师安师等宝刀不老，丹心未泯；论道论政论文论事有真知灼见；各位同志有松柏气节高士傲骨，无藤蔓谄媚市侩俗气。多位文星握生花妙笔著春秋文章，无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弊。胸怀天下，悲悯苍生；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纵然为某观点争论面红耳赤，仍然为求真理显现促膝长谈。居庙堂之高哀民生之多艰，处江湖之远叹世风之日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承继伟人足迹，传播真理火种。

纵观朱师之旨，重在拯救世界重荷；揭秘朱师之妙，首推创新共产文化。他创新中国梦，提出哲学表达式：老子+马克思；创新共产主义，提出道德经+共产主义。究其源渊，乃是从马列毛→西学（含黑格尔、尼采、爱因斯坦等）→中学（墨杂法、儒道佛、世界宗教等传统文化）而来，含英咀华，锻造真金。餐风露宿，一路血雨，一路坎坷，最终停留于道德之乡，且发现西游记与道德经，与马列毛一脉相承，同频共振。古圣云：朝闻道，夕死可也。今亦云：觅真理，向死而生。

道德经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有利于形成道法自然、实事求是、服从真理、服务人民、五大保障、公平正义、人民幸福、人类解放的时代共识。此乃当代哲学界、思想界、理论界所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体现为满足当代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新思想、新理论、新哲学、新文化的迫切呼唤。

朱师放眼世界，发现东西方文化各有优劣。西方优势在于自然科学，东方优势在于哲学社科。其新文化克服了东西之差异，克服了经典理论之混乱，明确上升到一种极高境界：自然共产主义 ABC=共同主义。此乃老聃倡导的道德境界，亦是人类理想之道德境界。提出共产主义 A+B+C，即文经政 ABC，堪称共同主义、

共同社会、人民社会、道德经、西游记模式。换言之，以老子《道德经》“自然→道德仁义礼|智信爱勇愚←天真”为标准，称道德境界，又名“如意金箍棒”。惟如此，方三材齐全，要素完备；乃全面发展，健康社会。大哉！自然为根，活人为用；道德为本，智信为末。

大道至简，实现共产主义易知易行。朱师学术成果现实可用，乃基于自然人的天道基点，可真正克服物质异化和人情偏见。致虚极，守静笃。以自然人为根据，关注真实人现实的需要，乃真正的“言有宗、事有君”。理论有根据，思想有基点。破迷成悟，转识成智。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遵道贵德，无往不利。毛伟人言先破后立，结果先破易，后难立；先立后破，阻力最小。朱师言五立：立真实、立真理、立真话、立真正、立真人。此五立可破各种歪理邪说，且可立正知正见。北冥居星辰，堪为指引；正道传世间，乃为方向。为活人服务，要素不缺；救世间疾厄，方法良多。为国分忧，为民纾困；淡泊名利，甘得寂寞。叹兮！昔朱子儒学，概为王权作侬，乃使人作茧自缚，沦为犬儒；今朱师共学，方为大众请命，乃使人身心解放，成为主人。孰轻孰重，孰优孰劣？自当了然而于心。当代圣人，呼之欲出；高标韵致，古树开花。

可叹红尘，生命危脆，无常迅速；光阴如白驹过隙，人生如百代过客；苦多乐少，灾难丛生；众生万象，物欲横流；天灾人祸，如影随形；颤颤兢兢，如履破冰。吾国当前，内忧外患，积重难返；八面埋伏，四面楚歌；资本扩张，盛宴狂欢；贪腐分子甚嚣尘上，邪恶势力飞扬拔扈；汉奸走狗堂而皇之，崇洋媚外招摇过市；正气不扬，文明式微；邪气反升，道德沦丧。宗旨抛却，初心已忘；道义无存，利益至上。昏昏噩噩者众，坦坦荡荡者寡；全心全意为民众者鲜见，处心积虑谋私利者居多。贪腐分子祸国殃民前赴后继，黑恶势力欺行霸市屡禁不绝。民生重负步步攀升，幸福指数节节下降。医疗教育乱象纷纷，住房养老困难重重。养尊处优者锦衣玉食，出力流汗者捉襟见肘。巧取豪夺者鸡犬升天，老实本分者屈居边缘。拍马溜须者畅行无阻，刚直不阿者步履维艰。专家教授中小丑居殿堂，平民百姓中大师住草房。狂呼乱叫歪理邪说尤有市场无限风光，搔首弄姿鬼哭狼嚎，圈粉无数赚足银两。不择手段者笑贫不笑娼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无恶不作者看正不压邪，坚认撒财即可消灾祸。呜呼！礼崩乐坏，莫言道德，连法也不守；

信仰尽失，休言理想，连理亦不讲。文明古国，文明衰落；圣人之乡，圣道不张。可叹可悲！

高层以铁腕拨乱反正，玉宇依然难以澄清万里尘埃。人民疾呼公平正义革故鼎新，举世切盼海晏河清盛世太平！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人民安危，志士当担，苟利国家生死以。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党群携手，众志成城。视人民为江山，共产党人丹心向百姓，自我革命；以天下为己任，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义不容辞；为百姓谋福祉，有识之士敢向潮头立，身先士卒；为万世开太平，圣贤人物妙手著文章，立言立德。有人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凭谁问：不言方向，路在何方？顶层设计，人民至上；文化引领，制度保障；全民创业，万众创新；文化先行，科技引擎；贵道重德，弘扬正气；清除社会丑恶行为，扫荡世间污泥浊水。人人团结奋进，个个意气风发。万丈高楼平地起，千里之行始足下。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爱国志士任重道远！

赫赫阳阳，日出东方；大鹏展翅，尘翕风张。当今世界，风云激荡；人民觉醒，惊涛骇浪；资本主义，日暮残阳；共产主义，光芒万丈！赤旗世界，斗志昂扬！看我东方大国，将让世界举目观望！赞我龙的传人，会给人类带来希望！神州共沐金色阳光，寰宇同饮玉液琼浆！

2023 年 10 月 30 日

天文苑：重订堪定中华民族新六经倡议

天文苑 2023-12-13

新时代，自当有新气象。立足新气象，亦能成就新思想。从新思想出发，必能培养出一批融华夏九千年思想为一体的新时代、新思维、新文化、新思想人才来。

文化自信而文化开新，自当是文化思想先出而结合行动连贯落实，若无新时代的新思想、新文化作为引领，仅只是“反复于曾今旧故，不见得能广泛传播”的文化内容，显然不是新时代的刚需，也必然会被新时代所抛弃。

为此，天文苑基于自我的感受，从一些看到的现象入手，来做一个倡议——

重订堪定中华民族新六经倡议。此倡议，不见得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或可以作为一些有心于文化事业的朋友作人才培养之参考借鉴。

一、图书浩如烟海，更需要有纲领

有人或许会说：“古人留下的东西已经够多了，我们学习就好了，甚至学也学不过来，不需要重新发明，也没有必要重订堪定什么中华民族新六经”。

初听这样的言论，似乎非常有道理，也完全是实际情况，但问题是浩如烟海的书籍你都要读吗？一辈子能读完吗？

就比如宋朝的类书《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也是不错的大部头，也花了不少功夫整理。可怎么样呢？几乎无人问津。原因何在？没有新东西呀，都是从各个地方把内容摘抄过来。这样做意义很大吗？从查阅资料的角度来看确实有意义，而于真正的理论创新来看，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没有新观点，没有新思想，也没有总结性内容，更没有独特的新思维，干嘛还要看呢？

再如《四库全书》，又真正做了什么重大贡献呢？显而易见，没有任何大的建树，反而是藏污纳垢。

试问一下，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把《四库全书》，又或者说《太平御览》、《太平广记》都看一遍吗？用常人眼光来审视一下，所有人都看一遍就不现实。既然都不现实，那为何还要动不动的就给大家一个书籍浩如烟海的概念呢？为何不从快速学习、高质高效学习掌握一个理论思想入手，节约、缩短全体国民的学习时间呢？

试想全体国民，每一个人都花三十年时间去阅读浩如烟海的书籍，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又有多少人需要这样去做？很显然，需要进行广泛阅读的少之又少，同时全体国民都这样来做了不仅浪费时间，而且还是全民消耗。甚至，其中还有不少东西是重复累赘的，是需要去糙取精的。

书籍虽是浩如烟海，但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恰恰也需要有纲领，能否把浩如烟海的书籍变成很小的书册，这恰恰就是可以去思考的。就比如《论语》、《大学》的注解，千百年来有太多的注解，光看各种不同人的注解就需要花不少时间，不是专门做学术研究的，其实是没有必要去看的，只需要掌握其中的道理就可以。如此，就需要进行删定，删除多余重复累赘的部分，变成短小精悍的内容，这恰恰就是一个当下急需要做的工作。

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以笨拙的方式读《论语》、读《史记》的，更不需要所有的古籍都全以笨拙的方法读一遍，恰恰需要的是全新、带有纲领性的文化学习。

时代之需下，我们不需要浩如烟海的各家各派对《论语》的观点和看法，而是一个纳各家看法的简版《论语》品读手册。只要一册在手，天下我有，而不是每一个人都去翻无尽的书藉。这就是当下新时代“重订堪定中华民族新六经”的第一个意义和价值，缩短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效率。节约每一个人的时间，就是珍爱每一个人；提高每一个人的学习效率，就是老师对学习者的最大帮助。

二、结束文化乱象，继往开来

鉴于历史曾经种种，立足于今天我们更需要的是全然的文化开新，重新构建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理论体系全息，而不是如曾经一样不断的堆积各类书籍，让学习者永远都有看不完书的感觉。

历史的曾经，孔子修订六经，形成了二千五百年来的影响。立足于今天，我们可以借鉴参考孔子的做法，重新构建中华民族理论体系，重新修订华夏新六经以正中华国学。从上到下形成中华民族的全新教学体系，也就是真正的国学——一国之学，国家基础教育之学。

试想中华家国重新修订了新六经，并按照新六经的方式来培养人才。假以时日，会不会真正出现一批融贯东西古今的全新人才？他们不仅对华夏九千年理论思想有独特的见解，还对世界历史五千年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学无古今，自然可以站在历史的当今当下超越历史的曾经；学无东西，站在历史的当下，自可立足于超越东西理论思考而构建全新思想体系。

今天是华夏历史文化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一时代变局之下，我们不能单纯的去思考传统文化，也不要单纯的去否定一些事情。而是把这些东西都放在历史九千年中去思考，用华夏九千年的视角来思考当今当下的所有问题，或许所有的乱象也就能够得到解决。

不管是遵从、信奉于谁，来到当今当下，不妨正本归宗，让文化历史回归到九千年的时代当中去。彻底结束当下的文化乱象，也彻底改变当下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局面，同时也枪毙那一些只能拿着《大学》、《论语》坑蒙拐骗的文化骗子。

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文人以注解为饭碗，不仅没有给学术带来新的思想，反而从此导致了天下文章一大抄。还真不是曾经一批人的思想已经很完善了，完全没

有一个需要改动的地方，并不是这样的，而是一代代的人越来越不如曾经了，并不能在相应理论上作出相应超越性，因而也就天下文章一大抄，还美其名“古人的思想很完善了，不需要发明”，其实只不过是为自己的无能找了一个借口而已。时代之下，恰恰就需要对诸如此类的很多乱象进行终结性处理。

于时代的今天，站立在两千五百年后，不应该再继续打着孔子的旗号行事了。可以说，今天不管是打老子旗号、还是打孔子旗号，又或是其它各种口号标语的，大多都是相应的内容都没有理解透，还要借此来捞钱的人。如此，不被贴上骗子的标签，天理难容。

基于种种乱象，以及各种半吊子阿猫阿狗的坑蒙拐骗，我们不妨考虑重新修订华夏新六经以形成新时代新文化引领，同时重新设置新六艺以作为华夏家国天下每一个人养家糊口的技艺之学。如此，或可以真正解决三千年未有之文化变局，真正把孔夫子解救出来，而不是放纵文人继续坑蒙拐骗，或是纵容一些人拿着《论语》、《大学》、《道德经》读一百遍就用来混饭吃。

三、重正国学，鼎立自信

说起“国学”，很多人就认为读读《三字经》、《千字文》、《大学》、《论语》、《孟子》等等一类的东西就是在读国学了，实则不是如此。“国学”的定义是“一国之学”，作为华夏家国的国学，不仅仅只是以孔子为代表的相应古典书籍，还包括天文历法、民风民俗、诸子百家、诗书礼乐、中医中药等等中华民族九千年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是全体国民的系统之学，而不是现在市面所宣扬的国学，这是需要进行区分的。

“国学”是国家之学、一国之学、国民基础之学、天下生民之学，是国家教育体制从上到下展开的国民学习，而不是某一个人打着某一个旗号来展开读经，这恰恰是需要重点注意的。当然了，在今天也只能感慨一句“官学失守，下落四方，学在四夷”。

家国之本，天下生民之计，当有一场从上自下的全新文化构建。1840年后，国内形成了一场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的文化新浪潮。敢于批判、敢于否定、敢于打破，是那一个时代的特点，而遗憾的是打破了之后并没有真正形成全新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理论构建，这恰恰也就是那一个时代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这也就是很多人说“百多年来，中华文化不自信的根本原因”。

于其中，我们也得去思考一个问题，他们一批人为什么要进行如此否定？真的就是文化传承没有一点问题吗？这其实也就是今天很多讲古典经学的人没有思考过问题。他们这一批人要破除的恰恰是那一个时代的腐朽和堕落不堪，其间有不少是中华民族的千年余毒，比如董仲舒的三纲，汉儒的无建树，再如宋儒鄙陋、明的寡德、满清的奴化，这些都是自当批判和审判的。

作为那个时代的先驱，他们精神可敬可佩，同样也有不足。就比如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人物，他强烈批判时代的不足。同样，批判到深处也带来了强烈的无力感，最终也只能留下《彷徨》、《呐喊》。作为那个时代的他们，除了要破除旧观念对人心、人性的束缚外，还要面对列强的虎视眈眈，自当肯定其精神之所在。

当然，时过境迁来到当下，我们自当重新审理、重新来看待。一百年前的一批人，他们的批判也不是空穴来风的否定，面对腐朽和堕落不堪，没有他们的强烈批判也是不可能形成影响力的。不重力打破，恐怕也难以凝聚当时的社会人心，毕竟那个时代无数人的内心深处都充满了腐朽、鄙陋、丑态和扭曲，不重力出击，又怎么可能取得些微效果呢？

同样，也得感谢他们的重力打破，对文人的腐朽、对陈规烂条的重力打破和摧残。不然，今天难说不会文字狱更加深重。或许，历史曾经的这一个契机，也是在为我们今天来重建华夏文化理论体系作铺垫。

作为时代的新思维、新文化、新思想倡导者，他们可以说尽职尽责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沿着他们的思想，总结他们的优缺点，来重新构建全新的华夏文明理论体系。

今天来推崇古典经学，不是为了复故，把曾今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搬出来，而自当在每一个有心于文化事业的人心中形成于一个高远的文化构建目标，不是为了拿《大学》、《论语》来当招牌，而是真正目标于全新的中华文明理论体系构建。

其实，回过头来思考，也并不是一百年前的一批人彻底否定形成了文化不自信，而是三千年来有权有势的太彘文人、文人老朽、老朽文人不自信，这才是根本的点，是他们影响了华夏三千年来的文化腐败，症结在他们，不在其它地方。我们看汉儒和朱熹他们一批人就很清楚，他们真正于文化有多少构建，显然是没

有的。

从文化建树来看，两千五百多年来起到根本支柱性作用的是孔子，董仲舒只不过是借题发挥，打着孔子的旗号出售自己的东西。至于说王阳明、陆九渊、曾国藩只能说在自己的思考范畴上做了一个自我展示而已，有可以参考的地方，但配不上圣人，可以学习，但绝不是榜样。相比较而言还不如朱熹，朱熹好歹还敢于打破，直接从《礼记》中提取《中庸》、《大学》作为单本学习，题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虽有各种要接受批判的地方，却也敢作敢为。至于其它各家人士，不管是王弼、还是来知德，又或是相关注解《五经》的人，都不过是在借题发挥，并没有什么新颖。

重建文化自信，首先第一个要开刀就是文人，整治文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断了他们投机取巧的念想，“重新勘定新六经”让他们好好学习，而不是拿着一点自己都不信的东西来忽悠人。强制这些文人好好参与学习，考试不合格就淘汰，让其哪里好去就去哪里。

国学重正，自信重建，可从新六经重订开始，整治文人也亦从此处来展开。

四、融古今一体，避开大杂烩

历史上也有不少修书的事迹，比如满清修订的四库全书，这一个就是彻彻底底的大杂烩，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扔，既没有新颖的东西，也没有总结性的理论观点在其中。

再比如，此前某些人编定的《大典》，虽然内容涵盖了各方面，但没有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玩《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的剩饭，无非不过是东拼西凑搬了一堆东西放在一起，这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

无论是《四库全书》，还是《太平御览》都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也没有多稀奇。特别是在今天这一个时代，更没有意义和价值了，很多东西都可以通过检索而得到，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任何一个懂一点电脑技术的都可以编撰一套类似的东西。不过就是把现有的东西进行归类归档存储，不仅不值得称赞，还要进行重大的批评，就不能有一点自己的思考和独立见解吗？不该批评吗？

对此，天文苑提供九条参考要求：

1、修订要如孔子修订六经一样，进行整体性的规范，而不是东拼西凑弄一堆东西在其中。

2、内容要简单明了，使今天的读者一读就能理解一大半，再加上老师授课就可以掌握基本。不要长篇大论，弄得看的人都没有耐心学，这就得不偿失了。

3、文辞要优美。修订《诗经》，就要像读孔子修订的《诗经》一样，读起来很美。修订《四书五经》，基本要如《四书五经》一样读起来优美，不然没有必要弄。

4、文辞浅显，读起来通俗易懂，而不是弄一堆大家读也读不懂的垃圾出来。也不要弄一堆文辞都不通顺的狗屁文言文出来，这些都没有意义和价值的。

5、不要大杂烩，什么都往里面扔，而是选择性、批判性的选取内容。对没有意义和没有价值东西，果断舍弃，不犹豫半分。

6、要有总结性的理论思考出来，而不是直接搬运古人原文，这没有意义和价值。当今天下已经有太多的抄书匠、搬运工了，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多了。

7、不仅只有现有的六经内容，还要包含民风民俗、民艺民技，以及当代的化学、物理一类的技术性理论和自然物理在其中，而不卖弄古人的东西，并认为那些东西是天下独一无二，要融古今为一体，不然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同时，还要借助华夏人的思考和思维方式，重新编写其相关的自然物理内容。

8、结构上考虑天文、人文、地文，而不是单纯的只看到仁义礼智信，要看到背后的理论思想和理论结构。所以强烈建议有心于文化事业的同胞同人，都好好学习一下天文历法，最少也学习一下天文苑的三五课。

9、不仅只考虑编写起来舒服，修订起来爽快，还要考虑具体怎么来展开教育教学，怎么广泛的推向世人，不是弄一堆堆在书桌上的垃圾，没有看差不多如同垃圾，而是编定当代能适用，未来能很好传承的新经典。

总之一句话，不制造一堆没有用的垃圾出来，不仅要考虑融通古今，还要有总结性的创建，更重要的是其中要有新颖的理论思想出现，而不是当啃老族，啃曾经的死骨头烂东西。当然了，还需要设定一条权限，那就是修订以后，允许天下人来质疑不合理之处，而不是一人独大，弄出来就神圣不可侵犯。见解独到、观点新颖者，给予赞赏和金钱上的奖励。

五、重订堪定新六经纲要浅说

诗——借“天文律吕”重新校正“五音六律”音准，以《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为根基，重新堪定“诗三百”。

书——以“天文历数”为根基，参考于《尚书》，重新堪定、精简二十四史，以“少而精，直指核心、要领”为方向来校正。

礼——以“天文历法”的“月令”为根本，考校原本“三礼”内容，补入后世精华精论。

乐——以“乐记”为骨架纲要，以“天文律历”为血肉，重新编册“千年乐律”。

易——以“天文历法”为根本，以“通行易”为主干，以“纬书”为参照。

春秋——“不失于时”本为春秋，春秋在孔子哪里是列国之史。于当今当下，可参照孔子《春秋》进行新刊，同时纳入不失时的《黄帝内经》。

如此，华夏当世当代的新六经文化体系也就形成了。

六、结束语

《重订堪定中华民族新六经倡议》也仅是抛砖引玉，此非一时一刻能完成的，需要更多同胞同仁的努力，也需要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出来才有可能在当代完成。

当然，寥寥数语也不足以回答这样一重大话题，内容也仅供参考，也并不是什么完全的定论，此文也只不过是草稿展示，难登大雅之堂。有更好的思考，更好想法的朋友，也欢迎批评指正。内容也限于网络，不便公开太多。对此话题还想听一听天文苑看法的朋友随时欢迎交流，天文苑也很愿意把与之相关的更多观点分享给大家。

此事也并非天文苑能做到的，天文苑也无力做此事。公开此文，也仅只希望更多的同胞同仁在培养人才方面可以更多的从这个角度去考虑，我们都共同期待：假以时日，能有一批可以真正出来修订华夏新六经的新型人才。他们能以自身的能力融汇古今，构建出全新的华夏新理论思想体系来，真正做到理论思想的震古烁今。

【卢其旺专栏】

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的真相（中）

——读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

卢其旺

题记：有必要纠正有关“糖衣炮弹”的一个说法，
不是“敌人送来的金钱美女”，而是“自己捧着的不受约束的权力”。

中篇：什么人被杀？

[内容摘要]读过谭合成先生《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令人震惊之余，蒙发探索“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真相的冲动。在写作中，发现内容太多，于是分为三个问题探讨：什么人杀人？什么人被杀？什么人制止？并分为上、中、下三篇进行阐述。本中篇，是探讨“什么人被杀”，得到与谭合成先生不同的真相。

谭合成先生认为“道县文革大屠杀”的真相是——错在文革；笔者认为“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的真相是——错在反对文革。为什么会不同呢？原因在于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存在两条不同的认识路线。一条是文革势力所提倡的，大方向斗争“党内走资派”，但理论不彻底；一条是反对文革势力依据的“空想阶级斗争”，他们转移文革大方向，专门斗争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挑起“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道县反对文革势力掀起杀人事件，就是这条错误路线引起的，被杀的就是一些造反派、地富五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子女，甚至包括孕妇及出生 20 天的婴儿。

文革之所以失败，在于其理论不成熟。除了上篇揭露的没有正确认识新中国建立起来的公有制是“少数人公有制”外，本中篇揭露出还有对阶级斗争缺乏深刻分析，一是对“空想阶级斗争”认识不足，二是对“走资派”没有定义，其原因是对公有制时代的“糖衣炮弹”缺乏分析。

[关键词]道县 文革 杀人事件 真相 人道主义

有必要重复纠正谭合成先生的一个提法，不是“道县文革大屠杀”，而是“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这是上篇“什么人杀人”的题记，旨在揭示“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的真相是——反对文革势力在杀人。

本文的题记是：有必要纠正有关“糖衣炮弹”的一个说法，不是“敌人送来的金钱美女”，而是“自己捧着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反修防修，防止“糖衣炮弹”腐蚀党的干部队伍蜕化变质，所以重提阶级斗争。但是，由于“少数人公有制”，“糖衣炮弹”不是来自于历史遗留下来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建立起来的公有制具有“两重性”。由此，对于阶级斗争学说存在严重的误解，导致反对文革势力借机转移大方向，挑起群众斗群众，不仅杀害地富分子，而且杀害更多的无辜子女及人民群众，丧失基本人道主义。

追查湖南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的真相，必须问三个问题：什么人杀人？什么人被杀？什么人制止？本文是第二篇，就第二个问题“什么人被杀”，进行阐述。

一、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两条路线

上篇已经指出“真相是真理的揭示”，并通过揭示“地球自转”真相，是“日心说”真理所揭示的例子，说明“事实→理论→真相”的认识论路线。其中“理论”是不是“真理”，其检验方法只有依靠实践。历史事件是人类的实践，对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正确解释，即追究历史事件的真相，是检验理论是不是真理的解释功能。

谭合成先生揭示“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的真相是主张文革势力在杀人，我们认为他说的真相不是真正的真相；笔者通过他的“所观公正”的材料，得出相反的真相——反对文革势力在杀人。有一条基本人道主义——杀害手无寸铁的人总是错的——这是摆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道理。那么“什么人杀人”，什么人就是错的。笔者在上篇《什么人杀人》一文中，已经用谭合成先生的材料证明道县“反对文革势力在杀人”，所以错在反对文革。

但是，无论是主张文革的势力，还是反对文革的势力，他们依据的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依据同一个理论，为什么有对有错呢？这就

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不成熟的地方，没有分清阶级斗争学说的两条认识路线。

必须肯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正确的，它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证，又经历了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井冈山道路的实践验证，是新中国的建国理论依据，所以是一条真理。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后，当然需要继续坚持阶级斗争学说，否则就是背叛。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出了问题，出在不同的两条认识路线。

要认识阶级斗争学说，必须首先明确阶级斗争的前提条件——剥削与压迫——哪里有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阶级斗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就没有阶级斗争。

新社会时期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他们剥削过谁？压迫过谁？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他们，这样的阶级斗争就是无根无据的，我们称之为“空想阶级斗争”。空想阶级斗争的错误，一是来源于教条主义，即依据马列理论教条，不依据实际情况；二是来源于经验主义，即看到历史阶级斗争经验，不看到实际情况的变化；两条错误都是不结合实际情况。毛主席以及他的理论班子，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这是文化大革命“理论不成熟”的重大表现之一。不过，他们也有部分纠正，一是反对“血统论”，二是提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政策，给其子女出路。但是，这种小的修补不足以纠正其错误，结果给道县反对文革势力杀人，提供了重大理论依据。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不是毛主席冲动，不是中央领导个人恩怨，而是有着历史的必然原因。这个原因在上篇“什么人杀人”中已经分析过，正如天津工人董中华所指出的，新中国建立的公有制是“少数人公有制”，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公有制”的先进性；另一方面是“少数人管理”的腐朽性。由于对“少数人绝对管理”缺乏认识，这样一个“糖衣炮弹”，不是来源于敌人，而是来源于内部，来源于自己创造的经济基础。由于对自己捧着的“糖衣炮弹”缺乏约束，从而导致发展为“官僚特权”。官僚特权发展导致国家政权出现脱离人民群众的问题，十七年得不到纠正，引起人民群众的愤怒，引起毛主席的不满。所以“毛主席一挥手，亿万人民跟着走”，于是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目标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在“少数人公有制”条件下的发展。但是，由于对阶

级斗争认识不彻底，斗争目标缺乏根本性分析，即公有制缺乏“剩余价值”分析，缺乏“剩余价值二次分配”分析，导致“走资派”没有定义，实际斗争的目标就成了所有的当权派。于是，对阶级斗争学说的理解就出现两派，你斗你的“走资派”，我斗我的“地富五类分子”，造成全国大乱，人人自危。毛主席依靠威望取得武汉七二〇事件胜利，从而稳定了全国局势。但是，道县反对文革势力没有停止，继续“空想阶级斗争”，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杀人。

这就是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两条认识路线，一条是主张文革势力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是正确的，但是理论不彻底；一条是反对文革势力的“空想阶级斗争”，他们是错误的，其目的与行动具有私利性，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就是这股势力所为。道县被杀的是造反派、地富“五类分子”、及其子女，甚至包括孕妇及出生 20 天的婴儿。

二、把造反派与地富分子联系起来

道县文革与全国一样，第一阶段分为造反派与保守派的两派群众组织，造反派简称“革联”，保守派简称“红联”。1967 年 7 月 20 日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全国的保守派已经在中央命令下得到解散，文革第一阶段以造反派获得完全胜利而结束。但是，道县却不同，第一阶段的保守派不甘心在县城的失败，由武装部与县委会的在职领导干部牵头，带领“红联”转移农村，妄图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样，原保守派群众组织“红联”，就变化为行政组织，公开对抗中央决定，杀害无辜的人民群众。

杀人是件大事，总得有个理由。于是以阶级斗争名义，编造“造反派与地富有联系”的谣言，大开杀戒。为便于理解，特重复上篇的相关内容，从群众的顺口溜开始。

“8·5 会议信号弹；8·8 抢枪导火线；

下坝大队开杀戒；喜鹊郑家点烈焰。”

（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第 20 页，以下凡引用该书时，均只注 Pn 页码）

所谓“8·5 会议信号弹”，就是 1967 年 8 月 5 日在县委党校召开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总结，做报告的是所谓亮相干部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对文革形势做

了错误估计，言称其发展不仅是国内派性斗争的事情，而且扯上了地富反坏，扯上了蒋帮反攻大陆，扯上了美帝发动世界大战，制造紧张状况。把“群众组织”变为“行政组织”，性质起了变化。

所谓“8·8 抢枪导火线”，就是湖南省、零陵地区造反派于 8 月 8 日来道县武装部抢枪，道县“革联”当然有参与。这就使形势更加紧张，“红联”不仅没有解散，而是转移到农村，县武装部坐阵指挥，区武装干部任“前线指挥部”负责人。（P31-32）这种公开对抗中央处理“武汉七、二 0 事件”精神，是一种公开反对文革的行为。

所谓“下坝大队开杀戒”，杀第一个人朱敏，颇费了一些周折，先是开会造谣说他与造反派有联系，最后是七、八个人黑夜里乱踢乱打而打死的，以便查不出凶手。

“8 月 13 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五巨头’（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讲话中，重点点了朱敏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与会的区领导陈智希的讲话更生动：‘革联’要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你们还不行动起来，还睡着不醒？’会后，朱家训一行人带着公社领导的指示精神，匆匆赶回大队去（杀朱敏）。”（P33）

所谓“喜鹊郑家点烈焰”，就是喜鹊郑家大队杀钟佩英，造谣说她与省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有联系，准备暴动，进行了残酷地杀害。

郑家大队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说：“历史反革命郑元君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P39）

其实，后来据处遗办公室了解，全是谣言。杀害钟佩英后，又担心她的两个儿子将来报复怎么办，于是又回转来，连同她的两个儿子一齐杀害了。所谓“点烈焰”，就是从此这个公社就开始了大屠杀，“蒋文经亲手批杀 95 人。这个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刽子手后来被提拔为下蒋公社党委书记。”（P40）蒋文经只是一个公社秘书，杀人后升为公社党委书记。

为什么杀地富分子要与造反派联系起来呢？就是要找个理由。单纯杀造反派不行，因为在县城武斗搞输了，而且中央还支持造反派。单纯杀地富也不行，因

为朱敏在顶撞寿雁区公安助理员陈智奇时说：“陈部长钢刀虽利，难杀我守法之人。”（P33）只有把造反派与四类分子联系起来，才能够与“阶级斗争”的理论挂上钩，才能够造谣生事。

三、杀人风的形成

从谨慎杀人，到“杀人风”的形成，确实有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是那么的短暂，那么的迅速，原因就在于“行政组织”的高效高能。

“道县文革大屠杀期间，道县的实际权力是掌握在以县人武部为核心的各级抓促领导小组手上。有证据表明，煽动和部署杀人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这条线贯彻的。”（P78）

1967 年 8 月 21 日是道县杀人事件的一个“飞跃点”。这一天，本是零陵军分区赵尔昌副司令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47 军 6952 部队梁连长（P60），来道县制止武斗、制止杀人的，但他们不是召集两派群众组织调查和研究制止武斗、制止杀人，而是单方面召集所谓“红联”一方会议。被召集的是各区各公社的武装干部，听到的是“革联”如何杀人、如何杀贫下中农、如何组织反革命暴动的谣言，于是“制止会”就开成了杀人“煽动会”。47 军有一份《社情电报》，把谣言确定为真，更成了煽动者手中的正式文件。

“这份据‘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证’的电报，现已查明所述全部‘敌情’无一属实。……如‘组织反革命组织’之说，当时道县报上来的 7 个‘反革命组织’全系假案。至于‘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等，更是连影子都没有的事。它将一些道听途说，甚至是别有用心制造的谣言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确认下来，又经道县基层政权层层传达、宣传、印发，成了‘阶级敌人翻天的铁证’，甚至成了煽动和实施杀人的依据。笔者（谭合成自指，下同）在道县采访时，听得很多杀人事件责任人在谈到‘杀人风’兴起的原因时，都说到了这个《社情电报》，他们说：‘这个《社情电报》对当时的杀人风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贫下中农看到这个电报，以为四类分子真的起来暴动了，上山当土匪了，急得要命，也就不管青红皂白杀起四类分子来了。’”（P62）

于是，杀人事件就迅速达到高潮。据处遗工作组在零陵地委和湖南省委的汇报材料中，把整个道县杀人事件分为四个阶段，这种分法基本是客观的。

“1967 年 8 月 13—20 日为第一段，主要表现为零星和自发的（事实上是农村基层干部策划组织的一一笔者）杀人。这一阶段历时 8 天，是杀人风的开始阶段，共杀 81 人，占杀人总数的 1.8%，全县只有寿雁、四马桥、清塘三个区杀了人。

8 月 21 日—25 日为第二段，这个阶段出现了全县第一次杀人高潮。多数区、社开了不同类型的杀人会，动员部署杀人。历时 5 天，共杀 807 人，占杀人总数的 17.9%，全县 10 个区 36 个公社只有少数公社没有杀人。

8 月 26—30 日是第三段，不少地方搞起了突击杀人，补火杀人，平衡杀人，掀起了第二次杀人高潮。这一段杀人是在‘不准乱杀’和‘罪大恶极的可以杀一、两个’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历时 5 天，共杀 2454 人。占杀人总数的 54.5%，全县 36 个公社全部杀了人。

8 月 31—10 月 17 日为第四段，是杀人风的制止和缓慢平息阶段……历时 48 天，共杀 1177 人，其中大量人员系被逼自杀，占杀人总数的 25.8%。

与上述四个阶段相对应的有四个标志性事件：

- 一、8·8 抢枪事件；
- 二、8·21 营江汇报会；
- 三、8·26 营江政法工作会议；
- 四、8·29 47 军 6950 部队进驻道县。

从上面材料不难看出，8 月 21 日这一天非常重要，从这一天开始，道县“杀人风”迅速席卷全县，呈现有组织有规模的杀人态势，不但被杀人数激增，而且这天之前杀人多少还要找上那么一条、两条莫须有的罪名，这天之后就进入了想怎么杀就怎么杀的状态。”（P62-63）

8 月 21 日，即零陵地区军分区副司令员到达道县的时候，亦即上述第二个标志性事件“8·21 营江汇报会”，掀起第一个杀人高峰，也就是“制止会”开成杀人“煽动会”。

四、“革联”成员被杀情况

在杀人风中，造反派“革联”成员是道县的首杀对象。因为是杀害重点，所以防范也是重点，自然在杀人总数中就不占重点了。

“这个地理位置也决定了上关区与营江公社一样，是‘红’‘革’两派生死搏斗的风尖浪口。由于‘革联’的不断渗透，该区四个公社的‘阶级队伍’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分化，有少数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倒戈到了‘革联’一方，比如东门公社基干民兵连长李成苟等人就连人带枪进了二中，成了‘革联’下属的‘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指挥部’的头头，还兼任‘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指挥长，一天到晚背着步枪，‘带着一帮四类分子的狗崽子在道江镇横冲直撞，耀武扬威，把贫下中农的肺都气炸’。这帮家伙的破坏性比四类分子大多了，‘革联’把他们当幌子举在前面，以隐蔽自己的‘反动本质’。因此上关区在文革杀人事件中，不仅杀地富，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杀‘叛徒’。所谓‘叛徒’指的是贫下中农社员和基层干部中同情‘革联’观点或者参加‘革联’组织的那样一些人。”（P76）

除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当然被杀外，贫下中农参加“革联”的，一律视为“叛徒”。一旦视为叛徒，当然就在可杀之列了。即使怀疑为“革联”成员，也在可杀之列。俗话说“除死无大事”，有什么仇恨需要促动杀机呢？就因为文化大革命意图夺取他们手中的权力，把权力视为私有的反对文革势力，就促动杀机，并且丧失人性，丧失基本人道主义。

“东门公社友谊大队有一个 26 岁的贫农社员何善亮，是县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又是社教积极分子，应当说这次杀人事件中应该也是杀人积极分子，至少不会被杀，可是他却鬼使神差地参加了‘革联’，结果被‘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开群众大会宣布他的罪状有两条，一是私通‘革匪’，二是挖社会主义墙脚，60 年过苦日子时偷了生产队两菟菜。”（P76）

“类似案例在上关区各个公社都有，比如万家庄公社五星大队的干部因怀疑一个名叫张初学的青年社员参加了‘革联’，就把他牵出去杀了。”（P76）

“万家庄公社红旗大队（下龙洞村）的何子元是道县审章塘小学的校长、中共党员，也许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场杀‘四类分子’的‘杀人风’会刮到他的头上。据说他也是因为参加了‘革联’被家乡的贫下中农捉拿归案的。笔者曾向一位原‘革联’的头头求证过此事，在他的记忆中，何子元好像并没有加入过‘革联’组织，充其量是支持‘革联’观点而已。”（P77）

“最典型的是清溪区柑子园公社红星大队的报复杀人案：该大队社员唐从蛟（贫农）在 64 年农村社教运动时，揭发了大队支书唐共求、民兵营长唐福洪、

六队生产队唐进学等人贪污集体钱物、多吃多占的问题。1967 年文革‘杀人风’中，唐共求等人借口唐从蛟之子唐和安参加了‘革联’，是反革命，将唐家一家 9 口杀绝，包括不满周岁的孙子和怀有身孕即将分娩的儿媳妇。”（P71）

“道县一中学生杨悦坤，家在四马桥区大坪岭公社沙窝大队，暑假回家，路过兴桥公社，被民兵拦住盘查。打电话到大平岭询问，回话说他是‘革联’的探子，于是被押回沙窝公社与四类分子一起处死。行刑前，杨悦坤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竟被挖眼割舌。”（P13）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 22 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从长沙回到家乡道县祥霖铺区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可能讲过文革情况——笔者），谁知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P13）

这样的情况很多，谭合成先生没有做为重点报道。他有一个自我规定的写作原则，“旁证者众口一词，当事人供认不讳”，对于不是千真万确的事，不在他的报道中反映。谭合成先生本来是反对文革的，自然这方面记载得就很少，更谨慎了。

五、地富及其子女被杀情况

杀地富“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当然要与造反派“革联”联系起来。但都是一些谣言，其内容连造谣者自己都不记得，往往前后说法不一。不过，没有人与他们较真，因为一旦较真，就有可能被牵连进去，一同杀掉。道县地富分子及子女据统计占 91%。

“道县被杀总数是 4519 人，被杀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分分类，四类分子（含右派）1830 人，占被杀总数的 41.4%，四类分子子女 2207 人，占被杀总数的 49.9%，贫下中农 352 人，占被杀总数的 8%，其他成分 31 人，占被杀总数的 0.7%。”（P20）

说是“调皮捣蛋”的就杀，但这个标准很难把握。“用该大队一位干部的话说：‘这表现不就是一句话的事，说你好就好，说你不好就不好。’”（P56）论表现，一个婴儿有什么表现不表现的，只有 56 天，连名字也没有取，就被屠杀了。还有 20 天的婴儿，他有什么罪恶？

“顺便说说那个 56 天的孩子……这一天，他蜷缩在母亲张秀华浑身发抖的

怀中，睁着两只清亮的大眼睛，看着一群手持梭标、马刀的人(论辈份他当管他们叫叔叔或者伯伯)闯进家里，拉走了他 72 岁的奶奶、37 岁的父亲，12 岁的大哥和 3 岁的二哥。他拼命地哇哇大哭，凄惨的啼哭声中，一家六口转眼之间只剩两口。”（P100，剩下两口是转嫁后“改变成份”的妇女。）

“该大队（蚣坝公社后江桥大队）的一个典型案例是，一个不满 20 天的婴儿地富孙女邓满妹，被杀人凶手胡旺明拎起来，活活扔进窖眼里。”（P109）

这是一些什么人啊！怎么下得了手。有人说，他们是贫下中农，也是无产阶级。需要知道，贫农、工人如果不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就容易变化为“流氓无产者”。如果党的领导发生偏差，文革的“群众组织”就变化为“行政组织”。行政组织中的个人，不能有个人思想，而是由领导思想指挥下的集体意志执行者。他们杀人，就成了与蒋介石手下的壮丁、汪精卫手下的汉奸一样，只能是集体意志的工具人而已。这是缺乏基本人道主义的，稍微有点“仁爱”之心的人，就做不出这样的事来。所以，毛主席说，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道县所发生的问题，就是对基层干部与普通农民，缺乏党的正面教育所导致的。

“其他 22 个大队都是 8 月 23 日公社（蚣坝公社）开过杀人动员会以后才开始杀人的，处遗工作组定性为‘奉命杀人’，应当是实至名归。”（P111）

“光家岭大队有一口从前地质队探矿留下的废探矿井，两米见方，深 10 米以上……附近几个大队不约而同地把它选为杀场。这个矿井，先后接纳了 77 条生命。……第二天，光家岭大队敲锣打鼓到公社报喜，在公社大门口放了一挂万字鞭。”（P113-114）

还有与子女相关的也在杀害之列，如与海外关系结婚的，下乡知青中的地富子女等，都难逃厄运。6950 部队是 8 月 29 日进道县制止杀人的，但 9 月 9 日还在杀害下乡知青。

“熊运友原是解放军指导员，与吴秀芹恋爱申请结婚，因女方父亲在香港的海外关系政审不合格，于是他只好转业，与其结婚后安排在寿雁区卫生院工作。37 岁的熊运友做梦也想不到，8 月 31 日回家被拦在关卡，忘带证件，抓到寿雁公社。公社武装部长周元炳认识他，但怀疑他可能到二中串联去了，其妻又有海外关系，于是将他与地富子女一起干掉了。”（P15）

“九月九日早晨，我场（农场）杀人派头头杜××召开了一个‘贫下中农会

议’，提出杀李加太和曾波涛。……六个凶手来我场杀人。将曾波涛、莫方义、何婵娟等人捆绑、吊在梁上，……并逼问我们是否加入了青年近卫军。……首先，凶手用鸟枪打了曾波涛一枪，又用马刀连砍两刀，血花飞溅，这位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号召的好青年就倒在血泊中，惨死在刽子手的屠刀下。接着，许义成又被刽子手们用鸟枪杀了。幸好，6950 部队闻讯赶来了，他们发出命令：严禁乱杀人。我们从‘阎王’手里脱身了，幸免一死……”（P194 195）

甚至一个小学只有十几名老师，就有六名老师涉及“子女”之嫌，因校长不思保护，而分别由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杀害，（P225-228）真正是惨绝人寰。

六、以“叛徒”名义杀害无辜群众

如果以为杀害的都是地富“五类分子”，那种理解就太简单化了。实际在行动中，除了以与造反派有联系的名义杀害地富及子女，还以各种名义杀害贫下中农。据道县处遗办的材料，还有打击报复、杀人夺妻、顶撞领导、爱提意见、轮奸后杀、家有浮财、没有劳力、杀母情人、精神失常、没有名姓、没有理由……均以叛徒名义杀掉。

打击报复：“清塘公社月岩大队贫农社员曾保保在‘社教’中提过大队贫协主席陈智才等人的意见，文革‘杀人风’中，陈智才等人趁机报复，将曾保保杀害。当时曾保保已经怀孕 6 个多月，拖着大肚子被拖上杀场。被杀前曾保保苦苦哀求：‘我错了，我改正。求你们不要杀我，我肚子已经有了毛毛，硬是要杀我，让我生下毛毛再杀也不迟。’陈智才说：‘你想用缓兵之计，我们不得上你这个当！’一马刀剖开曾保保的肚子，胎儿翻了出来还在蠕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P77）

象这样的报复杀人案不少，如 P67 的贫农文尚易，P69 的中农何定信、何若英父子，P86 的下中农唐保珠，P106 的教师田自壁、P147 的贫农陈世富一家 6 口人，P177 的贫农熊福昌、P180 的贫农何余祥……

杀人夺妻：“唐家大队受害者中，有一个 23 岁的地富子弟叫胡祥贤，人比较老实，杀人时，生产队干部说：‘这个就不杀算了。’照理说干部开了口，应该躲得过这一劫，但其妻长得不错，劳动力也好。一个名叫熊天苟的贫农老光棍

看中了她，坚决要求镇压胡祥贤。此类杀人夺妻（或夺女）案，在道县文革大屠杀中，比比皆是，屡见不鲜，仅笔者手头资料就有 40 余起。唐家大队这起杀夫夺妻案的特色在于，就在熊天苟美滋滋地准备当新郎官时，没曾想到半路上杀出两个程咬金，这两个也都是贫农的光棍跟他斗起争，也要霸占，熊天苟气不过，干脆一刀子把女的也杀了”（P37）

顶撞领导：“据处遗工作组查证，上关公社在区武装部长刘厚善和公社党委书记杨道明等人的部署、指挥下，在整个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了 173 人，杀人手段基本为枪杀、刀杀、沉河三种。其中有一名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功的复员退伍军人杜朱忠。据查，杜朱忠就是刘厚善亲自批准“搞掉算了”的，因为他胆敢和领导吵架。”（P37）

爱提意见：“张明玉中农成份。初中毕业以后参军到了部队上，1964 年复员回乡。这家伙在外面当了几年兵，好像做了官回来，……爱提意见，差一点让他在生产队‘政变’成了功。……张明爱等人把他的手脚作一个大字状钉在墙上，张明爱亲自操刀一刀一刀把他活剐了。”（P107）

轮奸后杀：“梁先莲这个姑娘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美人，不但人长得乖（漂亮），而且聪明伶俐，能歌善舞，县剧团曾有意招收她，政审没过关。……她跟着那帮人‘造反有理’，参加文化大革命。有人看见她偷偷摸摸钻进二中参加了‘革联’，从二中带着反革命任务回大队搞“串联”。……8 月 26 日，梁先莲在惨遭轮奸之后，‘坐土飞机’上了西天。”（P81）

家有浮财：“该大队还有一个名叫黄义仪的下放人员，1962 年从地质队下放回乡，国家给了 1000 多元下放费，大队里有些人眼红这笔钱，文革‘杀人风’中乘机把他杀了，抄了他的家，没收了他的‘浮财’，每个生产队分得 100 多元。”（P81）

没有劳力：“石枳大队要求每个村子（生产队）杀一个，结果为了凑数，同时也顺便减轻集体的负担，熊家湾村将一个五保户杀了。”（P175）

杀母情人：“开会讨论时，红岩大队党支部书记周甫爱见大家不吭声，就说：‘你们不提，我来提。杀一个周甫文，再杀一个邱声凤，大家讨论一下。’大家不同意，因为邱声凤是他母亲老情人，只是个中农。还是打虎亲兄弟，周甫玉立即带领几个与会的民兵骨干将邱、周二人抓起来，又按照周书记的意见，拖出去

‘处决’了，这才散了会。杀了邱声凤以后，陈满女（其母）哭了一个晚上，只喊要上吊。周甫爱再三给母亲解释，不是自己要杀的，是上头指示的。”（P162-163）

精神失常：“正好有个宁远地方的癲子(精神病人)，叫刘洪福，疯疯癫癫窜到了这里，被站岗的民兵抓住盘查，见他‘装疯卖傻’，答非所问，认定是‘革联’派来的探子，送来公社处理。敬慎修亲自审问后，下令自卫营民兵将他与陈明勋等四人一起执行。行刑时，陈明勋四人吓得屎尿拉了一裤子，刘洪福觉得好玩得很，高兴得不得了。”（P146）

没有名姓：“1967 年 9 月 2 日，乌家山大队民兵看见一名单身青年妇女坐在茶山里歇脚。上前拦住盘问。妇女闭口不答话，战战兢兢地好像说是“广东”。……送到公社民兵指挥部，公社事情多，叫他们原自押回大队去。四个押她的民兵看看天色已暗，动了邪念，扒光这名妇女的衣服，将其轮奸了。轮奸后，害怕暴露，于是由郭成仕带头用锄头把妇女打死，弃尸塘中。”（P90）

没有理由：“王盛光领到尚方宝剑，立即通过兴桥公社武装部，指示金星大队民兵将中农杨贵清捆起来，并于当晚召开群众大会批斗。批斗后，谎称将杨贵清押送县公安局劳改，民兵杨飞吉按照王盛光等人事先的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中。……据查杨贵清被杀的主要原因就是有人诬告他参加了‘革联’。因为有些秘密处决的味道，对金星大队杀人行动影响不大。”（P94）

.....

总之，这样的事情很多，不只是杀地富“五类分子”。其理由不外两条，一是与“革联”造反有关，二是地富“五类分子”要翻天，一切要想杀的人，都往这上面扯。还编造什么人民党等七个反动组织，由此一切犯罪都变成了合法化，真是人间地狱。

七、“我们没有剥削”

被杀的人员中，最多的就是地富“五类分子”的子女。当年虽然生活简朴，但生育能力都是非常高的，一般都有四个左右子女。所以杀两个“分子”，就有一家“子女”，其中包括十几岁、几岁的孩子居多，甚至还有 80 天、56 天、20 天的婴儿。

这些子女，有的懂得一些政策，知道“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与其争

辩，希望有一丝生存的机会。但是，没有用，杀人者根本不听，反而说他们不老实。

“没有人反抗，都老实得很。只有富农周民正说，‘我们在旧社会吃过剥削饭，罪该万死！可是乃崽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能不能留下来？’可是（杀人者说），你是晓得的，已经开过会讨论了的，怎么留得呢？只好一起都杀光了。”（P131）

“邓贞凤的大儿子邹宝成当时 17 岁，拉去杀时，拼命地喊：‘我是新社会长大的，我没有吃过一天的剥削饭，你们不要杀我。’”（P105）

1967 年只有 17 岁的涂海珠，带着 11 岁和 8 岁的妹妹，逃跑出去，被一个老奶奶藏起来，并介绍邻公社的一个青年（当时任大队团支书）收留下来，结了婚算是“改了成份”才得活下来，她的丈夫也因此被开除团籍，但保住了三姊妹的性命。后来对谭合成先生讲述：“……你说我家的财产是剥削来的，不合理，你没收就是了，不要杀人嘛；你硬要杀人，旧社会吃了剥削饭的人杀了就算了，不要殃及后人嘛。我自己从生下来到现在都是靠双手劳动生活，从来只有多做少得的，没有少做多得的，为什么还要把我做剥削阶级搞？”（P131）

这是有幸逃出来，并且伸冤的子女，才能与谭合成先生相见，并诉说其悲惨遭遇。像这样逃出来的人们比较多，也就是后来上访者。他们的诉说，其道理是朴素的，其理论是可以挖掘的。这样的“阶级斗争”是不合理的，是人们想象出来的，称之为“空想阶级斗争”，即没有“剥削与压迫”事实。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依据的就是“空想阶级斗争”。

八、杀人放“卫星”

杀人成“风”后，各个区、公社、大队，都怕落后。向来比较稳妥的油湘公社跃进大队支部书记何芳乾，有些坐不住了。他在 8 月 25 日参加公社民兵誓师大会以后，根据公社统一部署，杀了两个姓左的“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左永祥、左昌允，一直就不再有什么动静。但是，运动总是要有人推动的。

“今天（8 月 28 日）上午，李部长（公社公安特派员李跃本）又在公社供销社的楼上召集各大队主要负责干部开会，会上，何秘书（公社秘书何润龙）传达了县里领导的指示，通报了全县的杀人情况，区里蒋部长做了“重要讲话”，

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油湘公社这一次在全县大落后了，不但公社落后了，自己的跃进大队在公社里面也落在了后面。”（P148）

回来当天晚上就召开大队干部、党团员、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会议，把李部长的批评与鼓励都讲给大家听。这个大队主要由姓何的与姓左的两个大姓组成，上次只杀了两个姓左的四类分子，难道姓何的就没有？姓左的心里不平衡。

“何芳乾见大家不开口，只得又起带头作用，报了自己生产队的名单。这一来，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五里洞（左姓的）那边了，好了，我们这边出了人了，你们那边革不革命？就这样，你报一户，我报一户，比着来，最后把全大队的四类分子及子女全部作为要杀的对象报了名，一统计共 61 人。何芳乾一看名单，犯了愁：‘这么多人，搞到哪里去呢？’副大队长左昌贵建议：‘石头山水库尾巴有三眼窖，搞到那里算了。’……何芳乾再三交代：‘今天晚上都要搞好，不然，明天上午就没有把戏耍了。’……五里洞村和洲子上村的民兵互换行动，并宣布要保密。”（P149）

这件事何芳乾觉得太大，必须向公社汇报。公社接电话的文革主任郑来喜，一听也“呷”了一声，然后就批准了，只是吩咐要小心些。于是第二日，即 8 月 29 日开始杀人。

“上午 9 点多钟，何芳乾带队押着 61.5 名（其中一名孕妇，腹中胎儿算半个）被杀对象，浩浩荡荡向石头山水库走去。后面还跟着一群人数可观的看热闹的队伍。天气热，捆得紧，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要人拖，大大影响了队伍前进的速度。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了，就请示何支书，用鸟铳将那两个老的打死，丢进河里。这一招立杆见影，整个队伍前进的速度马上大大加快，那些恐惧万分的人们，朝着死亡的路上迅跑。到了石头山水库的尾端，因陋就简地开了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 61.5 人的死刑。然后，验明正身，用马刀一阵砍杀，不论死活，推下三口窖眼里。又将稻草淋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烧，最后盖土掩埋。至此，加上此前已经‘处决’的 2 人，跃进大队大跃进，共杀 63.5 人。何芳乾可能没有想到（当时也没有作总结评比），他的跃进大队后来居上放出了一颗‘卫星’，一举成为全县杀人最多的大队。”（P150）

一个大队有一个在当地怕老婆出名的“老实人”当支部书记，却可以一次性

杀了 61 个人，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生杀大权呢？上级灌输给他们的是，文革就是一场整风反右的运动，也是一场土改的补火行动。那 61 个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们中大部分是子女，包括孩子及未出生的胎儿，从来没有剥削、压迫过任何人。他们大门不出，老实生产，从来不知道何为大字报，更不知道何为文化大革命，何为造反派，何为走资派。相反，比较“稳妥”又“凶狠”的何芳乾，不仅没有受到处罚，反而被提升为公社书记。（P150）

九、什么人被杀

还有很多材料要引用，受篇幅限制，只得删了又删，删了又删，还有这么多，真是罄竹难书。从 1967 年 8 月 13 日下坝大队开刀，到 10 月 17 日上坝大队封刀，历经 66 天，在解放军 47 军 6950 部队介入下，最后终于平息了这一最疯狂的杀人事件。道县杀人总数为 4519 人，连同附近十县总共死亡 9093 人。这 9000 多人，是些什么人呢？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零陵全地区其余十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 9093 人，其中被杀 7696 人，被逼自杀 1397 人；另外致伤致残 2146 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含右派）3576 人，四类分子子女 4057 人，贫下中农 1049 人（部分人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部分人因报复杀人而遇害），其它成分 411 人。未成年人 826 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 78 岁，最小的才 10 天。”（P20）

在 9093 名被杀人员中，四类分子（含右派）3576 人，占 39.3%；四类分子子女 4057 人，占 44.6%；合计四类分子及子女被杀 7633 人，占 84%。称为与造反派有联系的“叛徒”的贫下中农与其他成分的 1460 人，占 16%。

什么人被杀？借口与造反派有联系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占绝大多数，造反派及与造反派有联系的无辜人民群众也有相当数量比例。所以，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的真相，就是非常明确的，即是反对文革势力在杀人，杀的是造反派以及借口与造反派有联系的地富及其子女，和一些无辜的人民群众，其中包括孕妇及婴儿，其残忍程度惊人。

十、结论：道县杀人事件的真相

从上篇“什么人杀人”可知，不是保守派群众组织，而是道县反对文革势力借助行政组织在杀人；及这一篇“什么人被杀”可知，是与造反派有关联的无辜群众，绝大多数是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在被杀。铁的事实证明着一个事实真相：道县反对文革势力在杀人。

请看 47 军 6950 部队为制止杀人而张贴的告示，其中有条：

“二、目前道县、江华、江永、宁远、蓝山、零陵等县农村成立的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其主谋者，要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三、对各县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必须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在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收缴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组织中的武器亦应封存上交。”（P194）

该告示说明，一是宣布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为非法，二是收缴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仅此两条，就可以真正达到制止道县文革时期的乱杀人之风。这就充分说明，是干部队伍中反对文革势力，借群众性“保守组织”，使其转变为“行政组织”后杀人的，杀人的目的就是威胁中央，以期达到破坏文革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杀人”的答案。

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建立起来的公有制，是“少数人公有制”，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有“公有制”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又有“少数人绝对管理”的腐朽性。这一腐朽性，就是新时代的“糖衣炮弹”，它不是敌人送来的财物，而是自己捧着的权力。社会主义的权力本是为人民服务的，但由于腐朽性，权力很容易成为烫手的“糖衣炮弹”。它不仅带来地位，带来财物，带来金钱美女；而且再小的官，再小的优越感，如果不加以约束，都可以演变为丧失人性的凶残杀人事件，道县就是范例。

由公有制的腐朽性，可以产生“官僚特权”，产生现代“特权利益集团”，极具反动性，道县杀人事件，以及现代腐败现象，都可以作为例证。文化大革命就是消灭这种腐朽性的，但是，由于理论不成熟，对“空想阶级斗争”没有批判，从而演变为道县“文革时期杀人事件”，同时各级又进行隐瞒和曲解，以致愈演

愈烈，以致丧失基本人道主义。

2023-11-30 于汉阳玫瑰苑

彻底批判“出身决定论”

——与同济大学王健教授商榷

卢其旺

近期，同济大学王健教授以真实的叙事、严整的论证发表了《不否定文革，那叫没良心；想否定改革开放，那叫没头脑》的文章，在网络上流传很广。许多本来赞同正面反思文革功过的朋友，被其论文困惑，一时没了主意。这篇文章的力量，是建立在事实上，不容推翻；加上论证逻辑严整，很有说服力。但是，这篇文章的结论却是错误的，它错在哪里呢？错在逻辑起点上。我们知道，逻辑起点错误，再严整的逻辑推导，只会得到错误结论。

我们欢迎这样的文章，只要是“摆事实，讲道理”的，一定可以把事实说清，把道理讲明。为方便起见，我们将王健教授否定文革的文章简称为《否定文》，并在本文的后面附上他的原文，以供读者对照参考。

一、《否定文》逻辑起点的错误是“移花接木”

《否定文》通过逼真的事实，以及议论逻辑严整，很有说服力。凡是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人，都能够感同身受。但是，在如此严密的逻辑推导下，为什么得出显失公允的错误结论，即“不否定文革，那叫没良心”呢？就因为，它的逻辑起点是错误的，把极端反动的“出身决定论”，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罪状。

王健教授不惜篇幅，诉说了—个事实：“让一个毫无过错的投胎者，一个尊严和上进心却完好无损的年轻人，仅仅因为出身而天然地被剥夺升学、参军、招干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平等机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古老歧视？最可怕的是，这种歧视甚至渗透到了生活最终端的具体细节，让每一个当事人背负从天而降的政治原罪。”这是事实，但这个事实被夸大了，不仅说成“每一个当事人”，而且说成“数以亿计‘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数以亿计的‘政治贱民’”。当年只有六亿到七亿人口，“数以亿计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显然是鼻子碰鼻子的人数，这种夸大实在没有必要。即便是少数人，王健教授的描述仍然是“出身决定论”的真实情况，凡是亲历者，无不刻骨铭心。

但是，这个真实的情况，却是《否定文》错误的逻辑起点。在此错误引导下，给予人们对文革的印象就是：文化大革命 = 出身决定论。

这是不正确的，也是不真实的。真实的情况是两者正好相反：

文化大革命 ≠ 出身决定论。

把不是文革的错误说成是文革的错误，这种错误就称之为“移花接木”，《否定文》正是犯的这个错误，它的逻辑起点就建立在这个错误上。

不错，“出身决定论”是极端反动的，文革期间曾经给予严肃的批判，亦即批判为“反动血统论”。但是，批判的力度远远不够，后来反而被一些人骂成了文革的罪状，这是需要深刻反思的。

《否定文》所说“出身决定论”的事实是存在的，确实令人痛恨。但是，它不是文革引起的，也不是文革所独有的。战争时期，就有一些形而上学者用此理论整人，成为历史教训；解放后因为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参与建国，情况好转一些，但是所谓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在文革前就严重地存在，已经形成思维定式；文革中又加上了“黑五类子女”而继续存在，虽然受到了一定批判，但这种歧视反而更加严重；文革后取消了“五类分子”帽子，表面上缓解了，但新的出身决定论又出现了，如“三种人”、“造反派”、“文革余孽”等新成份代替了过去的“五类分子”；改革后出现的“农民工”、“下岗职工”、“弱势群体”等阶层固化现象，成为新时期的社会鄙视链最底层，更有甚者，“退休双轨制”、“升迁关系网”、“阶层固化”大行其道，“出身决定论”更真实更广泛地存在着。

所谓“出身决定论”，就是家庭出身成份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命运。这是不正确的，许多剥削家庭出身而投身革命的大有人在，如恩格斯、列宁、周恩来等领袖；有些工农家庭出身而背叛革命的也是大有人在，如向忠发、赫鲁晓夫、周永康等败类。文化大革命正是要批判“出身决定论”，尽管批判不够彻底，但批判的态度已经表明。当一位高干子弟发表反动言论并流传全国，说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时候，说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时候，中央文革就已出面，批判其为“反动血统论”，并对其当事人进行了处理（后作为冤案被平反）。毛主席批判“唯成份论”，他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选择”，在全国传达，受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欢迎，至今历历在目。虽然批判的力度不够，不足以制止该反动观念的肆虐，但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表明态度，与“出身决定论”划清了界线，这是再明确不过的事。

为什么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表明态度，而“出身决定论”依然肆虐呢？谁都清楚，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斗争是异常复杂的。出身决定论有利于一部分反对文革的人，这正好是他们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工具，挑起群众斗群众的武器。文革期间不是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吗？好啊，都是阶级斗争嘛，你斗你的走资派，我斗我的五类分子，于是，阶级斗争这面大旗，就这样被公开歪曲了。改革开放后，走资派不斗了，于是五类分子也不需要斗了，大家一团和气，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也因此被取消了。

这就是“出身决定论”的真相，然而这个真相却被《否定文》移花接木成文化大革命的罪状，而且言之凿凿。如果，硬要把它栽赃给文化大革命，那才叫做“没头脑”、“没良心”，或者叫做“别有用心”。

二、丁玲与方方不是一回事

王健教授用丁玲与方方的不同遭遇，来比喻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的不同，告诉人们，“从阶级斗争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并说现在，“当有人煽动用文革阶级斗争手段对付方方时，反对和质疑方方的人们大多没有响应；当有人号召武

林壮汉用拳头群殴方方时，政府公权力决不会袖手旁观。”王健教授“以实求实”的态度偏离了方向，因为这不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我们没有发现王健教授所说的情况，一方面“有人煽动用文革阶级斗争手段对付方方”，另一方面“有人号召武林壮汉用拳头群殴方方”，方方自己的言语里也没有这样的恐惧。王健教授所举例子不是来源于普遍事实，而仅是极其个别的叫喊，不足以代表时代的意义。

其实，丁玲与方方不是一回事，虽然她们“都是女性，都是中国作家”，但她们的性质完全是两回事。

丁玲是右派，但那是一个错误政策所造成的冤案。当年的基层干部与人民群众是没有责任的，对他们是同情的，在许多情况下还是照顾的，这方面有许多感人的故事。虽然有许多不明真相的基层干部与人民群众，做出了许多过火的行为，但没有一个右派去报复他们，这就是明证。对于党犯的这个错误，也是历史进程中难免的，有毛泽东的责任，也有邓小平的责任。许多右派也能够正确理解，认为母亲犯错打了孩子，能够恨母亲吗？所以，右派还是爱党爱国的。

方方则不同，不是党与国家在犯错误，而是人民群众处于艰难困苦的大疫情面前，党与政府处于艰难决策的时刻，蛊惑人心，乱我大政，剑指党与国家，妄图配合西方黑恶势力，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当然受到一切热爱祖国的人们共同讨伐，在网络上以当代年轻人为主力。然而方方均骂为“极左”、“文革余孽”，以攻击年轻一代。这样的人，怎么可以与作家丁玲相提并论呢？

这样的人，造一些低级的谣言，如“满地无主手机”，已经参加武汉抗疫的护士们辟谣，但她仍然不改，以为上纲上线，其实世人均可以分辨真伪，而所谓作协主席却不能分辨。殊不知实际情况可能更为严重，火葬场对无亲朋陪伴的尸体只能按编号火化，根本不敢碰触尸体，无法丢弃手机，炉火红通通，焚化冷清清，惨状无以言表，作协主席却想象不到啊。

这样的人，装着为弱势群体鸣不平，而弱势群体从根本上是热爱祖国的，与她们不同道。如她在日记中“同情”的敲锣女、蛋壳女，当《方方日记》以神速在国外出版后，他们均用微博与其划清界线，不愿意做递刀子者手中的工具。有方方的朋友“园地作者”不能理解，发表《你为苍生说人话，苍生把你骂成狗》，公然痛斥苍生，与苍生为敌。他们不知道，再弱势的群众，也不愿意有人拿他们当工具，来黑自己的国家，这样“人话”就变成了“鬼话”。

今天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们对文革的了解，是从“全盘否定”文革的政策和舆论中得到的。他们反对方方，不是从文革的立场出发的，而是从当前疫情与中美贸易战中体会到的，可以说，与文革毫不相干。但是，方方一类精神美国人，以为“全盘否定文革”是大局所定，只要骂为“极左”、“文革余孽”，就是政治正确了。殊不知，这是打错了算盘。感谢方方一类精神美国人，是他们为文化大革命“平反”了，原来文革仅仅是这个样子。

我们允许言论自由，但不能允许造谣自由；我们允许信仰自由，但不能允许卖国自由。方方之流的行为，与西方黑恶势力相勾连，对抗我国战疫大好形势，

是明目张胆的反面教员，她与丁玲完全是两回事。现将丁玲与方方的种种不同，列表显示，以供分辨。

表：丁玲与方方的对比

对比项目	丁玲	方方
1、性质	冤案	不冤枉
2、国家环境	国无大事	国家正遭遇 2020 大疫情
3、个人态度	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整风	向西方提供甩锅工具《方方日记》
4、党与政府的态度	党正在犯错误	党和政府没有发声
5、基层党组织的态度	不明真相	个别学校对其追随者有处理
6、广大群众的态度	对其同情，并且照顾	对其不满，特别是青年网民
7、少数群众的态度	对其批斗，不够理性	没有人动粗，比较理性
8、其对群众的态度	没有怨怪	骂群众为“极左”、“文革余孽”
9、其对党的态度	没有怨恨	仇视党和国家，力求改弦易帜
10、其对西方的态度	学习西方，但不盲目崇拜西方	崇洋媚外，并与西方黑恶势力勾连
结论	不是一回事	

三、“出身决定论”比“反动血统论”更反动

为什么对“出身决定论”的批判不能够彻底呢？就因为当年的中央文革对其认识不够深刻，这是需要深刻反思的。

他们以为将其批判为“反动血统论”，就已经上纲上线了，就已经批倒了。他们对阶级斗争复杂性理解的天真，严重阻碍了对其的批判。他们没有认识到，新社会出现的“出身决定论”，是比“反动血统论”更反动的思想观念。

第一，反动血统论有伪善一面，而出身决定论却是赤裸裸的。反动血统论是封建王朝时期的反动理念，它的主要内容是“龙生龙，凤生凤”，显示其出身血统的高贵，犹如英国皇族、日本天皇的后人，让人羡慕不已。反动血统论还有伪善道德的掩盖，行使“牧师”功能，没有人公开谩骂底层社会，如果确实有少数人骂的话，那也必定会受到社会性广泛谴责。但是，出身决定论的反动观念，却没有伪装，能够在新中国堂堂首都，有那么几个高干子弟，发表演讲，写出大字报，流传全国，说什么“老鼠生儿打地洞”，说什么“老子反动儿混蛋”，公开侮辱性地挑战传统道德，挑战社会主义道德，何其嚣张，何其歹毒啊。而且，上山下乡运动变成了对出身成份不好子女的惩罚，变成了破坏文革的工具，它的反动性岂是批几句“反动血统论”就能够停止的吗？

第二，出身决定论是“人造阶级斗争”，它的任务是掩盖真实阶级斗争。出身决定论是新社会出现的反动观念，但是它却是旧社会反动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借尸还魂在新社会的复活，借助的是新社会统治阶级，一批“打江山坐江山”的新贵老爷。能够以新面孔出现，迎合新时代人们的思想，能够以旧社会反动观念腐蚀人们于不知不觉之间，对底层工人和贫下中农最具有迷惑性，最能迎合底层群众的优越感，滋生“自然红”等不求上进的腐朽思想，而且打着的恰恰是阶级斗争的旗号。王健教授的感觉是对的，他说“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源自策略需要，既然是需要，没有阶级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人来”，出身决定论就

是“人造阶级斗争”，不是真实的阶级斗争。这种“人造阶级斗争”，其任务是掩盖真实阶级斗争，从而达到取消阶级斗争学说的目的。因此，它就好比任何其他思想观念更能够迷惑人，更具有腐蚀性，也就更反动。这种迷惑性、反动性，甚至连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们也于无形之中沾染上，成为破坏团结的毒素。

第三，出身决定论能够变幻形式，在改革开放中仍然存在。由于对“出身决定论”没有彻底批判，虽然五类分子、黑五类子女被取消，但其流毒依然存在。一方面对出现新的“出身决定论”没有抵制能力，对新时代阶级斗争处于麻木状态；另一方面部分左翼群众，仍然沾沾自喜于怀念那样的“当家做主”的历史优越感，甚至还有个别左派朋友，以过去的出身决定论来衡量改革开放后的大好形势，而忽略和淡化改革开放后形成的贪腐公行的阶级斗争新局面，不能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阶级斗争的根源是以剥削为基础的，“五类分子”、“黑五类子女”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剥削过谁呢？但是，新社会不劳而获的人员已经产生，剩余价值的二次分配使剥削重新存在，因此阶级斗争就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有阶级斗争，不论“为纲”，还是“不为纲”，它都是政治领域的纲领性事项。只要阶级斗争存在，就必然变幻形式，在新的形势下出现新的“出身决定论”。以“农民工”、“下岗职工”、“弱势群体”为最底层的社会鄙视链已经形成，“两极分化”的阶级斗争已经发生，新的出身决定论就难以磨灭，它就会以新的面貌向社会呈现。

总之，“出身决定论”是比“反动血统论”更反动的思想观念，它是“人造阶级斗争”的工具，冲淡和迷惑人们对真实阶级斗争的认识，它不仅让反动血统论的反动性不宜觉察，更有其腐蚀革命阶级于不知不觉之中的迷惑性，从而使革命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因此，彻底批判“出身决定论”，是任何时候的革命阶级都必须肩负的任务。

四、结语：彻底批判“出身决定论”

总之，王健教授的《否定文》是以移花接木的手法，把极端反动的“出身决定论”栽赃成文化大革命的罪状，然后否定文化大革命。真相不容歪曲，我们必须直面“出身决定论”，彻底批判“出身决定论”，还其本来面目。丁玲与方方不是一回事，方方是新时代的极其反动的反面教员。“出身决定论”是比“反动血统论”更反动的思想观念，必须彻底批判。

对于文化大革命，必须正确对待，正面评价它的功过是非。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一切“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都是错误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习近平总书记对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指示，是正确的。不能用前三十年的成就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的成就否定前三十年，前后两个三十年，都有成就与失误，必须应用“三七开”的方法，进行总结反思，进行正面评价。正面评价文化大革命，反思功过是非，彻底批判“出身决定论”，达到团结最大多数人民群众。

“出身决定论”伤害最深的其实是工农大众，那些“五类分子”、“黑五类子女”受到歧视只是表面现象，它掩盖了真实的阶级斗争，达到了取消阶级斗争

的目的，直接使工农大众所依靠的阶级斗争学说，弃置于脑后。丢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学说，使“出身决定论”变换着花样欺骗人们，说什么“官场情缘关系网”，你是某某的女婿，某某是你的干妈，一张亲情网，网尽了国民党、共产党，乃至前清皇族，都是精英的精英，高层的高层，受迫害、受歧视的永远是劳苦大众。因此，只有彻底批判“出身决定论”，提倡“英雄不问出处”，建立“志愿者干部储备制度”，促进“官民合理流动”的社会公平机制，才能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才能将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2020-12-30 于汉阳玫瑰苑

【作者简介】卢其旺，男，1946 年生，退休工程师，居住武汉市汉阳区。退休后从事哲学研究，有 4 篇论文入选第 24 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有 1 篇论文入选第二十回世界易学大会（在郑州召开），并获优秀论文奖。有两篇论文获国内一等奖、三等奖。出版论著三部，均为香港出版。

附：不否定文革，那叫没良心；想否定改革开放，那叫没头脑！

同济大学教授 王健

“在历史的进程中，存在着一种渐进、而又稳定的潮流——权力逐渐转移到大众手中”。

那些平时慢慢悠悠按照顺序发生的事，都会压缩在某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做出不可改变的決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决定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从 1978 年 12 月 22 日开始的那个历史段落，某种意义上就属于这种性质。

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这张报纸所覆盖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随后仅仅几十年特定的单位时间里，发生了地表史上最摧枯拉朽的变迁。

但真正令人感怀的，应该是在那些群峰般凸起的城乡建筑群的深部，冰山的水下部分，一个看不见的精神大陆正在缓慢崛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那个决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像整个大陆板块脱臼后历史性的复位那样地动山摇。

这是一个巨大的逻辑公理的转换，由此而延展出的所有引理，像血透一样革命性地更改和释放了人们的伟大天性，思想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所创造出的一切奇迹都在为这个转换做注解。

丨从阶级斗争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丁玲和方方都是女性、都是中国作家、都曾因自己的文字而遭到非议，但酷烈程度之所以完全不同，根本原因是因为她们中间隔了一个改革开放，从而使她们分别站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逻辑大地上，她们分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舆论板块和心理现场。

当有人煽动用文革阶级斗争手段对付方方时，反对和质疑方方的人们大多没有响应；当有人号召武林壮汉用拳头群殴方方时，政府公权力决不会袖手旁观。

这不仅是方方们的幸运，更是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幸运。如果你看不到这个伟

大而感人的历史进步，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亲身经历过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

今天，已经没有人相信方方会因为自己的言论而成为当年的丁玲、卞仲耘、张志新，更没有人会因为支持过方方而像当时“胡风的朋友们”那样夜不成眠、惶惶不可终日。

我们感怀这样的进步，不是因为我们糊涂，而是我们来自寒彻透骨的文革现场，我们能体察到改革开放的温度。

我们惊讶，在卞仲耘被学生活活打死的北师大附中校园里怎么会没有一丝犯罪后的恐惧气氛。

我们感叹，反而是卞仲耘的丈夫夜半不敢哭出声音而将床上的草席边沿咬到粉碎。

我们庆幸，自己的孩子不再会因为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打破了一个印有头像的水杯、坐在套红标题的人民日报上而惊恐万状。

阶级和阶级斗争也许客观存在，“阶级斗争为纲”却是主观臆断，其核心逻辑是：“八亿人不斗行吗？”这个逻辑的前提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源自策略需要，既然是需要，没有阶级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来，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就是一个证明。

于是，客观上果然就造出了一个人人自危的恐惧环境。阶级斗争真的就会溢出它本来的堤岸，而终于成了浸没一切的汪洋大海。

帕瓦罗蒂说：“歌剧是假的，但随着一点点展开，它就是真的了”。

今天的人们，对张春桥这篇凶相毕露的报纸头条早已恍若隔世。他们永远无法想象，当年的人们触目之下是如何的惊心，对那些历次运动中早已遍体鳞伤的家庭而言，佝偻在昏暗的灯光下，从字里行间琢磨深浅，在夜深人静时猜度轻重……

普遍的绝望就是希望。历史总有一天会像几米说的：我总是在最深的绝望里，看见最美的风景。

正是改革开放，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挽狂澜于既倒，把整个民族从“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恐惧症中解救出来，这是什么样的时代巨变？

| 从阶级成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逻辑，必然引出对人群进行严酷的阶级鉴别和分类管理。与印度的种姓制度、日本的贱民社会、希勒特的犹太政策相近的血统论以及它的变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像一片挥之不去的乌云长期笼罩在数以亿计的“政治贱民”心头。

让一个毫无过错的投胎者，一个尊严和上进心却完好无损的年轻人，仅仅因为出身而天然地被剥夺升学、参军、招干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平等机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古老歧视？

最可怕的是，这种歧视甚至渗透到了生活最终端的具体细节，让每一个当事人背负从天而降的政治原罪。

笔者当年在江西插队时，村里有一个富农的儿子，因为难以娶到媳妇打着光棍。有一天，我们几个知青兴冲冲去他家、敲开门的一霎那，我看到了一个永生难忘的眼神：极端封闭自卑的他勉强微笑中那掩饰不住的紧张、恐慌和乞怜，令人心疼的眼眸里折射出的是一个无可逃遁的巨大宿命，一个无助而绝望的滴血灵魂。

很多年以后，历史也许很难查考那些淹没在岁月里的人生至暗。人类匆匆向前的脚步也可能忽略被铁蹄践踏过的无辜青草，但它就像被齿轮碾过一样，曾经那么真实地烙烫在一个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每一天的生活里。

直到 1977 年恢复高考开始，以阶级出身为主要衡量指标的政治审查逐渐淡出历史，横亘在数以亿计“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面前的历史栅栏轰然倒塌，这也许是对 2000 年前孔子“有教无类”和 1000 年前相对公允的科举考试的一键恢复，这是最清脆的对无数绝望心灵的一声惊雷般的解锁。

是的，我们曾经赞赏美国黑奴制的废除、我们欢欣鼓舞于妇女选举权的开禁，可我们很少会公开庆幸，那些曾经深深插入我们生命的锈迹斑斑的出身标签，那看似天经地义的荒谬刺青，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地消失于无形。

上图所绽放的不仅是亿万张发自内心的笑脸，更是源自灵魂深处即将喷涌的智慧岩浆和天地初创期所积蓄的最原始动力。

通过高考所释放的，是全国范围内封冻了几十年的阶层流动性，改革让千万个饥渴的灵魂通过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种努力又使伟大而古老的祖国恢复了青春的模样。

| 从户籍制等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

如果说，高考的流动性释放，可以让张文宏、王行环（武汉中南医院院长）这些偏远农村的放牛娃跃迁为国家的铮铮栋梁，那么，相对刚性的户籍制、档案制、属地管理的改革则更是把几亿农民从阡陌地埂极大地释放出来。

看上去这是一次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工作迁徙，实质却是亿万鲜活的生命自由而伟大的东征。

长期以来，即便一个村支书、生产队长，也拥有对全村所有村民无可争辩的绝对管辖权，得罪了村长，就等于得罪了整个世界，因为你不可能在没有介绍信的情况下另谋生路。一个没有身份、没有档案、没有介绍信的人，几乎就等同于一个绝望的逃犯。

也就是说，你甚至连背井离乡、风餐露宿的最后一点权力都已经被剥夺殆尽，这才是对立于苍茫天地间一个个伟大生灵最最残忍的终极锁定。

改革开放多年以后，我在同济大学北楼一个教室门口，看到一张贴着的 A4 纸，那是学生手写的鼓动班级同学一起去旅游的几句歌词：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梦已经醒来心不再害怕有一个地方那是快乐老家……

对一个当年“生活的脚步困居在偏僻的异乡”的插队知青来说，真是沧海桑田，足以泪目。

表面上，改革开放前，特别是四人帮时期，严格的户籍制、属地制、档案制、

是对几亿农民自由迁徙的空间制约，但归根结底，是对人类自由本质的系统性、体制性侵夺。只有在这个维度上，才能更深刻地感知改革开放的解放意义。它所释放的不仅是整个国家经济建设最深厚的人口红利，更是整个中华民族最长远的精神红利。

因为，在本质上，它所释放的是公民谋生权背后更普遍的自由选择权。作为社会生产力最核心、最活跃的要素——劳动者，能否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正是从奴隶到自由人的决定性一步。这一步就像这块土地两千年来第一次在个体意义上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一样，完成了人的流动性最宏伟的解放。

而人的解放所焕发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然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物质的极大丰富又必然带来消费者更加广阔的选择权，选择所导致的竞争又极大地促进了产品（比如手机）的多元裂变。生命和整个社会终于在良性循环下，以它最该有的模样实践着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的预言：

“在历史的进程中，存在着一种渐进、而又稳定的潮流——权力逐渐转移到大众手中”。

改革开放也许是中华民族两千年历史上极为珍贵一段经历，是中国人民理性精神和自由品格最富有世界意义的进步。

我们深信：比高楼大厦崛起更重要的，是理性和常识的回归；比商品堆积如山更珍贵的，是尊严和自由的重建。

我们深知：不否定文化大革命，那叫没良心；想否定改革开放，那叫没头脑。

历史不能，也绝不会走回头路。即便人真的可能两次踩进同一条水沟，也绝无可能两次坠入同一个深渊。

那是因为：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主要不是灯火阑珊的不夜城、甚至也不仅是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豪感，而是那些留在我们自由而奔放的灵魂里的，如同河流留给山川的、润物细无声的永恒改变。

（完）

“哲”考

卢其旺

哲学的“哲”，有多个异体字，如哲、愆、喆、嘉，意义相近的还有哲。有人提出要用“喆”代替“哲”，说双吉有太极直观性。这就有考察的必要。

“哲”是形声字。《说文解字》言“哲，知也，从口折声；愆，哲或从心；嘉，古文哲，从三吉。”其中释“知”，古代通“智”，即有智慧或智巧。“哲”字怎么就通智慧了呢？从异体“哲”字，可看出“哲”字的本义。《说文解字》言“哲，昭晰明也，从日折声，《礼》曰晰明行事。”可见“哲或哲”的本义，是明晰之意。例如《洪范》有言，“视曰明，……明作哲（现代有人改写为哲）”。清人段玉裁解释古文有言：“《释言》曰：哲，智也。”“哲”是“明”的体现，而“明”本来修饰的是“视”，所以整个意思就是看得清楚，引申为明辨事理。

所以“哲学”，即意为明辨事理之学，而明辨事理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从古至今都称之为“哲人”。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一词，是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明治初期的启蒙家，以“哲学”来翻译英语中的 philosophy，即爱智慧，也符合“哲”字的本义与引申义，以后就固定下来，约定俗成，由此流传开。

有学者对哲学的“哲”，又有新的理解。如太极城哲学创新研究院“太极哲学学派”有老师认为，“哲”不仅是形声字，而且也是会意字。从字的组成看，从折从口，共同组成哲学的哲。其中“折”是转折之意，“口”是言说之意，共同表达“转弯说话”。在“太极哲学”微信群的讨论中，大家认识到，所谓太极，就是阴阳不断地转着弯，永远处于转弯的运动中，阴阳相遇力避硬碰硬，不要走极端，如老子所言“柔弱胜刚强”。归纳言之，“转弯”就是太极，研究这种“转弯”运动的“言说”，就是太极哲学。

也有学者认为“喆”好，如太极城哲学创新研究院“喆学学派”等老师认为，双吉“喆”能够表达阴阳太极的直观性。《说文解字》收入了三吉“嚳”，没有收入双吉“喆”，不过《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都收入了双吉“喆”，在“哲”字下用括号表示为异体字，没有单列辞项解释。对“吉”字，《说文解字》有云，“吉，善也，从士口。”这说明“吉”是一个会意字。“吉”由士口合在一起，表示士人说话，即知识分子说出的话。知识分子说出的话，多是一些漂亮话，当然吉祥如意，自然《说文解字》言“善也”。双吉合在一起，就如同双喜合在一起表示喜上加喜，自然双吉“喆”就是吉上加吉。这个字因具有双字形，于是联想到太极图，如同阴阳连在一起，双吉“喆”就有了太极的直观意义。

作为哲学学派的名称，用双吉“喆”是没有问题的，标新立异，有一定推广意义。但如果企盼用双吉“喆”，取代已经通过约定俗成的哲学“哲”，会有一些困难，搞得不好，可能流入“文字游戏”的泥潭中，值得注意。

2021-7-31 于汉阳玫瑰苑

【智者说专栏】

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哲学

如果一种哲学对人们没有用，便不是一种好的哲学，便不是人们所需要的哲学，而仅仅是一种思维游戏，甚至是语言的游戏。

一种哲学必须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精神素养，否则便不是一种好的哲学。哲学在西方被称之为爱智慧。哲学本身首先必须体现较高的智慧水平，并且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智慧水平。如果一种哲学绕来绕去晦涩难懂，让人们变得更加愚蠢，肯定不是一种好的哲学。

那么。人类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哲学？我们应该致力于构建一种什么样的哲学呢？简单说来，这种哲学应该在神学和科学之间找到并明确自己的位置，并且体现出神学与科学所不具备的特征与功效。

神学是玄妙的，但具有迷信的色彩。宗教神学最大的功绩在于解决人们的精神救赎问题。宗教神学虚构了一个神，从而导致了迷信。如今哲学需要做的是，把天上虚幻的神，拉回到地下了，真正让人们能够达到神的境界，解决神学所提出的至圣通神的问题。这个神，当然不再是迷信中的那个神，而是出神入化的神。是人们在认识与实践过程中所达到的那种天人合一、物我合一、游刃有余的境界。

科学对于人类的功绩是巨大的。然而，人类要想仅仅通过科学完全弄懂宇宙间的所有奥秘，就跟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一样办不到，因为科学所依赖的人类理性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人类要真正揭示宇宙的奥秘，必须最大限度地借助自己的灵性。

有关科学的局限性，已经有许多探讨文章，说明人们对此已经有所认识，在我看来，科学的局限性至少可以总结归纳为如下三点：

第一，科学无法完成所有必要的实证。就客观对象来说，有些可以实证，有些本身就无法实证。就主观能力来说，人的感知能力有限，无法完成所有应该完成的实证。科学可以对经验进行总结和归纳，对于超验的东西无能为力。

第二，科学无法把握偶然。我们可以把握那些感知所及的客观存在，却无法

把握过程中的偶然变故。这种偶然变故需要由灵性来把握。

第三，科学在人类实践中无法解决临场的灵性发挥问题。科学提供了一条条的规律，但是在实践中灵活地把握规律，却不是科学的事。如果仅仅局限于科学，那便是一种可笑的“纸上谈兵”了。

科学的局限性意味着人类理性的局限性，理性思维的能力是可以提高的，必要的逻辑思维训练是有效的。那么，如果我们实现了最成功的训练，发掘出了全部的理性潜能，实现了对所有复杂的问题都能够进行缜密而彻底的思考，我们是否可以突破思维的边界和智慧的极限呢？仍然不能！那些艺术家的实践，那些将某种技能修炼到出神入化地步的“成功达人”的实践告诉我们，这种突破所依赖的，已经不再是理性，不再是平常人们所理解的一般的智慧，而是那种不可捉摸的神秘的灵性。正所谓：上帝给我们关上了一道门，还给我们留下了一扇窗。

如何才能达到神学宗教所提出的“神”的境界，如何才能达到科学所无法企及的“灵”的境界呢？这就是通过感性直觉、个别知觉、辩证知觉、系统知觉，进入灵性直觉那种主客圆融、天人合一、物我合一、出神入化的境界。在认识中实现主观与客观的圆融，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圆融。而实现这种角色担当的哲学，我们可以称之为圆融哲学。

智者说工作室 2023-10-05

中国可能超越西方的关键点

中国能超越西方吗？我的回答是，目前看，很难；但是，存在着这种可能。而决定着这种可能性的，有一个关键点。这个关键点是什么，容我先卖个关子，一会儿再讲。

一

先来说说为什么超越西方很难——

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否超越其他国家和地区，首先表现在科技水平上。科技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和富裕程度。

现代科学技术发源于西方，我们中国是跟在人家后面学习的。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引进了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我们是在学

习借鉴的基础之上有了自己的一点创新。

科学技术是怎么来的，当然是靠科技人才的发明创造。而人才的培养最终归功于教育。我们的教育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

据最新统计，在全球领先的 1000 所研究型大学中，中国内地共有 191 所大学上榜，其中 10 所位列世界百强，比去年增加 2 所。其中，清华大学排名全球第 22，位列亚洲第一。北京大学名列第 29，浙江大学排名第 33。上海交通大学排名第 46，首次入围全球 50 强。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分别位列全球第 54、第 63、第 72 和第 89。中南大学、南京大学首次跻身全球百强，分别排名第 93、第 94。

这个数字自然令人鼓舞，但是，还有一个数字就令人汗颜了。在世界大学获得诺贝尔奖的名单里，中国的大学一个也不占，一直保持着 0 的记录。

现代大学应当从欧洲中世纪开始。那时候的大学与宗教联系在一起，主要用于培养牧师和僧侣，称之为修道院大学。在修道院大学的基础上逐渐的发展，形成了现代较为正规教育机构的雏形。修道院学校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公元 5-7 世纪是第一阶段，修道院学校主要针对牧师的培养。8-10 世纪是第二阶段，这个时期修道院分为内院和外院，开始了对外授课。11-12 世纪是第三阶段，开始具备了现代学校的特征，有了分科教学培养。由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罗马帝国的原有教育系统彻底崩溃，社会文化水平急剧下降。修士们开始承担起文化教育的责任，甚至有人一手拿着拉丁文法教科书一手拿着圣经教学的方式进行传教。培养有知识的教士成为了教会的必然需求。于是，第一所修道院学校——维瓦留姆修道院学校在意大利建立起来。

12 世纪后半叶，最早的大学以法国的巴黎大学和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他们被称为世界最古老的大学，又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后来各大学的建立模式都深受其影响。

现代大学最著名的有两所学校，一是牛津大学，二是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始创于 1167 年。是英国亨利二世为笼络人才，召回在巴黎留学的所有英国学生而创立的。从文艺复兴开始，牛津大学成为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它尤以古典文化和哲学研究见长。牛津大学先后培养了 20 多位首相，72 位诺贝尔获奖者，它对英国和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

哈佛大学创建于 1636 年，有人说“先有哈佛，而后有美利坚”。哈佛大学的诞生源于 17 世纪初，英国殖民者为了能够在美洲大陆长久统治下去，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河畔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学府——哈佛学院。哈佛大学先后培养了 6 位总统，截止 2021 年，共有 156 位教职工和校友获得了诺贝尔奖。

中国的现代教育起始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 年 1 月 13 日）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它以 19 世纪末日本学制为蓝本，该学制规定全部学校教育，分为 3 段 5 级：1）初等教育段 9 年：初等小学堂 5 年，高等小学堂 4 年；2）中等教育段 5 年：中学堂 5 年；3）高等教育段 7 年：高等学堂，即大学预科，3 年，大学堂 3-4 年。学生自 7 岁入学，28 岁大学毕业，共需学习 20~21 年。很显然，中国的现代教育是跟西方学来的，明显落后于西方。

我们可以把现代西方教育的出现，看做是理性时代的产物。现代教育的出现与发展是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得到充分展现的重要标志。

然而，现代教育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弊端。这种弊端恰恰体现在它本身所具有的并且曾经引以为傲的作用和意义上。这种作用和意义就是知识的传承。回过头看，没有这种传承是不行的，没有这种传承，人类已经发现和发明的知识无法普及；没有这种普及，便没有那么多的人获得必要的知识；没有这种传承与普及，现代科技无法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遗憾的是，正是因为这种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的发现与创新。在传承的过程中，很多无用的知识和伪知识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课堂。教师们为了饭碗，需要老老实实在地制作教案，规规矩矩交给学生去背诵。为了职称，需要拼凑出著作。

一提到哲学大家，如今的很多人都会想到海德格尔。一提到哲学巨著，如今的很多人都会想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可你知道这本书是如何出版的吗？

1925 年，马堡大学哲学系的哈特曼教授即将离去。8 月，系里向柏林教育部提交了一份推荐信，建议提升海德格尔为教授。然而，教育部却否定了这个建议，理由是海德格尔 10 年内没有发表任何东西。系主任找到海德格尔，敦促他尽快出版一部著作。为了提职，海德格尔在自己两部讲稿的基础上，以《存在与时间》为题，开始撰写书稿。一部讲稿是 1924 年的“时间概念”，另外一部是 1925 年的“时间概念史导论”。他把写完的书稿送交教育部审批，教育部认为“还不够

充分”。海德格尔再次充实后，直到 1927 年春，才在胡塞尔与舍勒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第八辑发表了计划全书中内容的三分之一。当年 10 月，又经历了种种波折，海德格尔终于如愿以偿被提升为教授。

从国外说到国内，我们的许多大学教授，为了晋升教授、副教授，拼凑出了多少文字垃圾呢？这样的文字垃圾，大多是靠花钱买书号出版的，书出版了，职称评完了，这些文字垃圾也就像其他无用的垃圾一样，被搁置起来，或者直接卖到废品收购站去了。

学生们为了取得文凭，以便获得进入社会的资格而老实地学习，要通过考试，必须背记大量的知识内容，这样就大大限制了理应得到发挥的创新能力。我们中国，则是这种填鸭式教育的最大受害者。这一点，我们无需进行深入的考察，只要比较一下我们的课堂与国外的课堂里的情形就不难推断。人家鼓励学生提出问题，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我们是几十个学生坐在那里鸦雀无声地听老师照本宣科。

痛切一点说，我们的大学，理工基本靠灌，文科纯属扯淡。试问一下，除了考古学之类有点知识类技术类的东西，在我们所谓的文科知识中，什么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有哪一条算得上真正意义的定理与定律。就这么扯来扯去，总有一些性情古怪的教授冒出几句荒诞的话来，于是“公共知识分子”，成了人们不齿的“公知”。

在中国有一个著名的顶尖大学，这个大学有个国内大学中顶尖的哲学系。在这哲学系里呆过不少国内顶尖的哲学大师。我曾经浏览过这个哲学系的网站，发现他们还出了一本杂志，叫什么《哲学门》。我仔细看了一下杂志的目录，顿时兴趣索然。所有的标题里几乎都有某某哲学家、某某哲学著作的字样。不知现在是不是仍然这个样子。我无意批评，无意贬低，更无意抵毁。只是想探讨一个问题，这种学习体会类的文章究竟价值几何？一直以来，我们总是强调学习，强调我们的思路要和以往的哲学家们“连”上，连来连去，都是复述原有哲学家的观点，“独立之思想”还有吗？学生为什么就不可以直面问题，为什么就不可以从“根”上思考出自己的一些什么来呢？

按道理说，上了大学，学生已经掌握了必要的语言工具，有了自我阅读能力和自学能力。一本书，或者说老师的那一套建材，学生一两天就可以读完，一两

个星期就可以读透了，可我们为什么还要让学生上大课，上小课去听讲，一讲就是一个学期呢？为什么不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讨论交流相互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来呢？

现代教育需要改革，我们也确实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实施了一些举措，包括过去所讲的“教育要同生产实践相结合”，如今的中小学减负，大学要办研究性大学等等。然而，我们之所以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教育的转型，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仍然在思想观念上一直以为，这种填鸭式的教育，教师容易教，学生容易学（只需调动记忆能力便可），一张考卷定成绩，学习成果容易评判，免争议。

从我们的教育现状推断创新人才的培养，我们要想超越西方，实在是太难了。无异于痴人说梦。

二

再来说一说，我为什么还要说中国仍然存在着超越西方的可能呢？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现与发明是靠人的认知能力实现的，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大大提升并延展了人们的认知能力。

过去我们需要靠个体去学习和掌握外语，现代翻译软件可以让我们很快就把外文的意思翻译出来。

过去我们需要用大脑去实现有限的记忆，现在通过软盘就可以实现大量记忆。我们需要资料不必绞尽脑计去想，也不必去翻阅书本，通过计算机上网，可以轻松查阅得到。

如今人们热议的脑机连接如果真正实现，人们则不必费尽一生中的大部分精力去学习了。瞬间就可以实现知识的灌输。而人类智慧的绝大部分功能，都可用于灵性意义上发明创造。

人类的智慧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感性，就其结果来说，对应的是经验；二是理性，对应的是科学；三是灵性，对应的则是哲学和艺术。

科学对于人类的功绩是巨大的。然而，人类要想仅仅通过科学完全弄懂宇宙间的所有奥秘，就跟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一样办不到，因为科学所依赖的人类理性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人类要真正揭示宇宙的奥秘，必须最大限度地借助自己的灵性。

有关科学的局限性，已经有许多探讨文章，说明人们对此已经有所认识，在

在我看来，科学的局限性至少可以总结归纳为如下三点：

第一，科学无法完成所有必要的实证。就客观对象来说，有些可以实证，有些本身就无法实证。就主观能力来说，人的感知能力有限，无法完成所有应该完成的实证。科学可以对经验进行总结和归纳，对于超验的东西无能为力。

第二，科学无法把握偶然。我们可以把握那些感知所及的客观存在，却无法把握过程中的偶然变故。这种偶然变故需要由灵性来把握。

第三，科学在人类实践中无法解决临场的灵性发挥问题。科学提供了一条条的规律，但是在实践中灵活地把握规律，却不是科学的事。如果仅仅局限于科学，那便是一种可笑的“纸上谈兵”了。

展望人类自身发展的未来，是内在的灵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实现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圆融，达到那种天人合一、物我合一、游刃有余、出神入化的境界。

中国本土文化中有孔儒学说，有道教，佛教进入中国并融入本土文化后，讲究禅修、实修、内观、内省、直观。这种文化传统被西方称之为“神秘的东方智慧”。这种东方智慧，无疑是有利于达到那种天人合一、物我合一、游刃有余、出神入化的境界的。我说中国仍然存在着超越西方的可能，我所说的可能超越西方的关键点，就在于如何发挥出这种“神秘的东方智慧”。

人类文明总是在地域间的此消彼长中发展的，或许理性与科学在西方得以昌盛之后，“神秘的东方智慧”会在灵性直观中得以彰显。

如果你对我的这番议论感兴趣，敬请关注我的下文《神秘的东方智慧并非不可捉摸》

智者说工作室 2023-10-22

神秘的东方智慧并非不可捉摸

上文我曾经谈到，“如果你对我的这番议论感兴趣，敬请关注我的下文《神秘的东方智慧并非不可捉摸》。”下面我就在这里兑现承诺。

一

先来说一说智慧是什么呢？智慧与知识显然不是一个概念。是指人很聪明，头脑灵光，既不是愚蠢，也不是昏聩，形容人很聪明。灵魂通透了叫做醍醐灌顶。

一个人突然有了灵感，当然是智慧的最佳状态。

智慧既不同于知识，又不同于聪明。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很聪明，却不能说一个人很智慧。譬如我们说这个孩子很聪明，却不能说这个孩子很智慧。我们说一个人有智慧，却不能说一个人有聪明。我们说提高人的智慧水平，却不能说提高人的聪明水平。聪明具有先天性，智慧则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聪明。

有智慧，达到智慧的境界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处于聪明绝顶，灵魂通透的状态，就是能够让灵感如约而至的状态，就是灵性发挥出来的状态。就是人们常说的具有了创新能力的状态，并且能够实现发明创造的状态。

二

达到这种智慧状态是否有某种路径呢？当然是有的。让我们从下到上。通过人的智慧所通达的境界来认真体验一番——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说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宋朝晏殊的《鹊踏枝》“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第二种境界是宋朝柳咏的《蝶恋花》“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是南宋辛弃疾的《青玉案》“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人们习惯于将其理解为艺术创作、思想观念创新乃至人生奋斗与成功的三种境界。揣度起来，这三种境界，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人类认知活动的三种境界，第一种为独入疑境，第二种为苦苦求索，第三种为蓦然醒悟。

宋代的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曾经提出过佛家参禅的三重境界：

第一重：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此时，人们怀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与新鲜，对一切事物都用一种童真的眼光来看待，山本来就是山，水本来就是水。

第二重：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当我们用心地去体会这个世界，便有了更多的发现与思考，山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笼统的山，水也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笼统的水了。在山这一大概念下，有了许许多多的认识，草、树、石、崖、泉、溪、鱼、蛙等等，还有我们个人的主观感受，如峻峭、挺拔、雄浑等等。进入这些具体的认识领域，就如同我们陶醉在情节的描述中，却忘了小说的书名一样。

第三重：禅中彻悟，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这是一种洞察世事后返璞归真，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只是这山这水，看在眼里，已经有了更丰富的内涵，有了新的更高层次的整体把握。

说到认识的境界，人们习惯上理解的感性认识阶段、理性认识阶段，也可以说是认识的两个境界。

康德沿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认识过程包括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环节。黑格尔对此评价说：“在精神的范围内，应以分为三部分为主，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说是康德的功绩，他曾首先促使人注意到精神应分而为三的事实。”（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第 415 页）我们也可以将其归纳为三种境界说。

比较上述的境界说，以我个人的体验，我认为可以把人们的认识境界分为这样五个层次：

第一层境界：感性直觉。

在这一阶段，人们凭借生理的冲动、胆识和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行事。他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要这么做。甚至在开始的时候也说不出究竟应该如何做，仅仅是依赖感性的直觉，就这么做了。撞到南墙了，回头再向北撞。人们在开始做一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时，往往都依赖于感性直觉。当然，这种凭借感性直觉行事的，也有许多成功的范例。

第二层境界：个别知觉。

在这一阶段，经过无意识的探索活动，有了偶然的成功，并且有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和经验总结，认识了个别的道理，并且能够欣然地说出某种道理。当然，进入这一阶段的人，往往容易犯所谓“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错误。

第三层境界：辩证知觉。

到了这一阶段，发现了那些个别道理的自身矛盾，而且发现了和自己原来所掌握的个别道理相互对立的道理。懂得了“一分为二”，学会兼顾“另外一个方面”。当然，进入这一阶段，一些人又会感觉到迷惘彷徨，处事犹豫不决、举棋不定。

第四层境界：系统知觉。

进入这一阶段，不仅认识并兼顾相互对立的道理，而且实现了对于各种道理

的系统认识。对于世界从宏观到微观有了整体的把握。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轻松往来，触类旁通，各种道理了然于胸。无论怎么说，怎么做，都有自己的一套道理。正所谓“头头是道”。但进入了这一阶段，也未必事事成功。因为还有一个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结合问题。

第五层境界：灵性直觉。

在普遍地掌握了各种道理的基础上，“忘却”了各种道理。头头是道，同时又明白头头并不是道。因为“知之之道，不可待言也。”（《嵇康集·声无哀乐论》）佛祖释迦摩尼不是也说：不可说，不可说，说了即为错吗？进入这一阶段的人，认识主体所动用的不单纯是理性，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智力意义上的理解，而是一种参悟，一种全身心的体验。与这种智慧活动相伴的，至少还会有一种愉悦欢畅的快感和沉稳踏实的自信力。这时候，人简捷地凭借一种直觉行事。当然，这时候的直觉已经与感性直觉有了本质的区别。达到了一种出神入化、天人合一、无法言说的境界。

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这五层境界，我这里以打乒乓球为例作一解说：一个从来也没有学过打乒乓球的人，接过球拍，也可能打出一两个好球，这就是感性直觉；开始学习了，对一种来球有办法对付，这是个别知觉；经过训练，除了用一种方法对付这种来球外，还学会了另外一种方法，这后一种方法与前一种方法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可能是对立的，这就是进入了辩证知觉的第三层境界；除了对付一种来球，各种各样的来球，都有办法对付了，而且这些办法是多种多样的，这就是进入了第四层境界——系统知觉。大家都知道，高手对决，不再是比技艺，比的是一种状态，发挥得好，你就是进入了游刃有余、物我合一的灵性直觉的第五层境界。

上述五层境界，用我们熟悉的词汇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层，是无明确认知状态下的直觉；第二层，认识到一点，是“一点论”；第三层，认识到两点，是“两点论”，是辩证法；第四层，是认识到全面、系统，是“整体论”、“系统论”；第五层，是圆融的通灵。

进入了第五层境界，就是进入了灵性的层次，就是进入了通灵的境界，就是达到了佛家所谓的“大境圆融”、“大智圆融”的境界；也就是达到了孔儒所谓“圣人”的境界。

就人类的智慧水平而言，康德将其分为这样三个层次：感性、知性和理性。我以为可以分为这样三个层次，一是感性，对应的是经验；二是理性，对应的是科学；三是灵性，对应的是哲学与艺术。我这里所说的艺术，不是平常人们所说的艺术。遇到画家，我们会说，是搞艺术的，遇到唱歌、跳舞的我们会说，是搞艺术的。这些当然是艺术，但局限于这些，就窄了。我说的是一种大艺术，举凡把一定的本事修炼到极致，实践效果很神奇的，都可以称之为艺术，譬如战争艺术、决策艺术、管理艺术、用人艺术、领导艺术等等。力工依赖感性、工匠依赖理性，而大师所依赖的则是灵性。许多人承认理性，未必承认灵性，其实，灵性这东西是存在着的，如我们常说的灵感、灵机一动等等。一个人无论做什么，没有体验到灵感的，他的“作品”必然是平庸的甚至是拙劣的。

三

通达智慧的最高境界，我们需要把握哪些要点呢？有几个词汇需要我们认真领会。

第一是“空”。

我先来说一段故事，说的是在明朝，有一个大臣，因为替人打抱不平，得罪了一个大宦官，而且还顶撞了皇帝。结果被打了四十大板，并且被发配到边远的贵州去了。那时候，没有飞机，也没有火车、汽车。从京城到贵州，一路跋涉很辛苦。光有辛苦还不够，你得罪人了，人家还想灭了你。这个宦官派人前来追杀他。他察觉情况不妙，装作投水自尽，侥幸上了一艘商船。不料，这条船在海上又遭到台风袭击，随风飘到了福建海岸。上岸以后，他历尽千辛万苦，最终返回故乡浙江的余姚。与亲人告别之后，走江西、过湖南，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来到了贵州。由于来时匆忙，路途多艰，他来到这里时，手头没有什么书。只能凭记忆，重新温习以前读过的经书。这样做的结果，反而启动他的独立思考，跳出了“以经解经”、“以经注经”的窠臼，使之得以标新立异，创立新说。他在这里写成的《五经臆说》，成为其心学的开山之作，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一代著名哲学家的基础。这个“臆”字，颇为耐人寻味。不是照着书本去想，而是在没有书的情况下，凭借记忆，天马行空般地去想。说到这里，大家已经猜到了，我说这个人就是王阳明。

试想一下，如果他仕途顺利，转任到哪里都被人簇拥着，都带着“四书五经”，

最终不过就是封建王朝中一个普通的大臣。恰恰是因为没有书，靠着回忆、揣摩，最后成了一代心学大师。

我曾经说过，没有记忆便没有思维，没有遗忘便没有创造。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总要想着某些东西的。没有记忆里的这些东西，大脑空转不起来。佛家禅修的时候，需要静，需要把心思放空，同时，也强调要有个“话头”，由此思考下去。佛家强调的空，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既然想不通，既然想调动的灵感没有出现，没有来，不妨停下来，心思放空，重新起头再来。当灵感来袭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自己的心灵十分洁净，处于一种空的状态，任何的记忆都荡然无存了。相反，在没有灵感来袭的时候，则觉得心里很满，甚至是乱糟糟的。

我曾经把智慧比作火苗，把知识比作木柴。火是靠木柴燃烧的，你不能没有知识，但是，你的头脑完全被知识占据了，智慧的火苗又可能被压灭。

第二是“入”。

达到智慧的最高境界，在民间称之为“入道”。要入道首先要入“道”所在地方。道在什么地方，当然在客观对象那里。

德国经济新闻网站 2 月 28 日报道，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2022 年全球 PCT 体系共注册 27.8 万项专利，其中中国注册专利 70015 项，排名第一，其后依次是美国（59096 项）、日本（50345 项）、韩国（22012 项）、德国（17530 项）。德国新注册专利数量仅增长 1.5%，低于新冠疫情前水平。WIPO 首席经济学家芬克（Carsten Fink）表示，机械工程等德国传统优势行业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在计算机和数字通信技术方面，德国的增长不如其他国家。大多数已公布的 PCT 专利来自计算机技术，其次是数字通信、电气机械、医疗技术和计量技术。中国华为公司以 7689 项专利领先，韩国三星电子、美国高通、日本三菱电机和瑞典的爱立信均榜上有名。

看到这个报道我们当然会很高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来呢？我们大学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大奖，可是在不同的实践领域，我们的专利申请量又是最多的。说明智慧的成果不在课堂上，而是在不同的实践领域，在实验室。如果我们不能进入实践领域，不走进客观对象，固然是不能达到智慧的最高境界的。

第三是“融”。

直观需要体验，体验需要进入，进入实现圆融，圆融达到境界。很多人常说

“不二法门”。什么叫不二法门。平时我们用这个词的时候，总是从字面上理解，不二，就是唯一，就是没有第二个选择，这是唯一正确的法门。其实，这个不二法门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意思，我们认识事物，认识主体是一方面，认识的对象，或者说认识的客体是另外一个方面，这就是二，怎么能不二呢？就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圆融在一起，这就是不二了。

人类的全部活动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叫做认识，另外一种叫做实践。认识活动，是主观对客观，实践活动是主体对客体。这里所谓的“圆融”，在认识活动中，是实现主观与客观的圆融；在实践活动中，是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圆融。如何形容这种圆融呢？如果你有所体验，可以做出多种形容，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你如果真正实现了这种圆融，你对于客观、客体肯定会有那么一种亲近之感。

毫无疑问，实现了这种圆融，便是进入了天人合一、物我合一、游刃有余、出神入化的境界，便是进入了智慧的最高境界。

智者说工作室 2023-10-23